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中國」亞投行戰略之研究

**The study on China's AIIB strategy**

指導教授：劉德海 博士

研究生：李勁錡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 摘要

隨著近年新興市場崛起，尤以「中國」為代表，已劇烈改變舊有以歐美等西方國家為首之經濟發展模式，然而反觀現有以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為主之國際金融體系，仍延續美國獨大的強勢主導，不願相對反應「中國」逐年提升之經濟地位與需求。「中國」在尋求金融體制內改革失利、國內產能過剩、區域發展不均，及大國思維蓬勃發展等內外條件充分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2013年假雅加達向外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聯結「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沿線國家，促進區域整體經濟發展及一體化；並在多邊外交基礎上，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融資機構。

亞投行是「中國」由國際規則接受者走向創建者的重要觀察標的，也是習近平大國外交及戰略實踐不可或缺的砥柱基石。「中國」主導成立亞投行具有多重動機及戰略意涵，除展現提供公共財的大國風範與意願外，更隱含對外輸出「中國」主導的國際建制與規則、平衡美國獨大政經勢力、突出南方國家需求與利益，及宣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等戰略構想，是以亞投行隱含的戰略目標及對「中國」整體外交大戰略的佈局及功能殊值關注。

自冷戰後，經濟在國關領域扮演的角色日漸吃重，對國家權力的消長亦成為有力的衡量標準與觀察點，「中國」長期觀察國際情勢，善於將內部經濟發展需求與對外戰略結合，透過經濟外交手段團結南方國家，以「鄉村包圍城市」、「無產包圍資產」的路線推動政經改革，形成對抗北方國家集團的重要力量，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便是「中國」推動整體國家戰略的關鍵支點，凸顯了現今經濟政治化與國際關係經貿化的發展趨勢。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6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6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9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1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2
第二章 「中國」外交戰略的緣起與發展	14
第一節 「中國」外交戰略回顧	15
第二節 「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多邊主義與南南合作	21
第三節 習近平的外交思想與政策	28
第四節 小結	32
第三章 亞投行簡介	35
第一節 亞投行的成立與發展	35
第二節 「中國」籌設亞投行的動機與戰略意涵	42
第三節 亞投行制度簡介與比較	47
第四節 小結	57
第四章 亞投行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	59
第一節 亞投行貸款特性分析	59
第二節 亞投行助力「一帶一路」交通建設	67
第三節 亞投行助力「一帶一路」能源建設	72
第四節 小結	75
第五章 亞投行對國政經秩序的影響	77

第一節 美國、日本與印度對亞投行的立場與因應·····	77
第二節 亞投行對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	83
第三節 亞投行的挑戰·····	91
第四節 小結·····	94
<b>第六章 結論·····</b>	<b>95</b>
第一節 國際關係經貿化·····	95
第二節 臺灣對亞投行的因應之道·····	98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99
<b>參考文獻·····</b>	<b>101</b>



## 表次

表 3-1：亞投行籌設大事紀.....	37
表 3-2：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	40
表 4-1：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依區域）.....	61



## 圖次

圖4-1：「一帶一路」示意圖.....	60
圖4-2：「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示意圖.....	61
圖4-3：巴基斯坦高速公路示意圖.....	68
圖4-4：中亞各國位置圖.....	69
圖4-5：「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路線圖.....	71
圖4-6：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成員國.....	75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隨著近年新興市場崛起，尤以「中國」為代表，已劇烈改變舊有以歐美等西方國家為首之經濟發展模式，據世界銀行統計，2015年全球GDP總量達74兆美元，其中，總量排名第一的仍是美國，佔比24.32%、「中國」排名第二，總量佔比14.84%，遠高於第三名佔比5.91%的日本；「中國」自2010年起GDP總量即超過日本，打破自1972年起的「美國第一，日本第二」的GDP排序<sup>1</sup>。國際貨幣基金（IMF）2017年7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WEO）〉報告顯示，「中國」2017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6.7%，同期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為3.5%，美國成長率預估為2.1%，顯示「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之主要驅動馬達<sup>2</sup>，對全球經濟穩定成長扮演關鍵性角色。

然而，反觀現有以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為主之國際金融體系，仍延續美國獨大的強勢主導，不願相對反應「中國」逐年提升之經濟地位與需求。以IMF數據為例，目前美國是IMF的最大股東，擁有16.48%的表決權，「中國」僅占6.07%；另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以名義GDP總值計算，2013年美國GDP為16.8兆美元，「中國」為9.24兆美元，可知在當時「中國」的GDP就已超過美國的一半，但其在IMF所占份額仍不足美國的1/2，嚴重影響其貸款權益及國際話語權。期間「中國」曾試圖在現有體制內尋求改革，但受到來自美國的巨大阻力，2010年底，G20國家一致同意改革IMF，自己開發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超過6%的份額，以提升新興市場國家投票權，同時由歐洲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兩個執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IMF的影響力<sup>3</sup>，但因美國國會否決，改革案延宕至2016年方得生效。

---

<sup>1</sup> Imarkets，全球GDP總量達74兆美元各國占比排行榜，<https://read01.com/02A6Ro.html>（查閱日期：2017年10月22日）

<sup>2</sup>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查閱日期：2017年10月22日）

<sup>3</sup> 東方財富網，<https://kknews.cc/finance/j68y5nl.html>（查閱日期：2017年10月22日）

另近年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歐洲經濟整合面臨衝突，凸顯亞太區域發展中國家融資困境。亞洲既有金融機構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銀）報告指出，2010年至2020年間，亞洲各國要維持現有經濟成長，內部至少需要8兆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平均每年需要8千億美元的投資，惟既有的多邊金融機構難以提供如此龐大的基建資金，其中亞銀的總資金約為1600億美元，世界銀行（下稱世銀）也僅有2230億美元，兩家銀行每年能夠提供給亞洲國家與地區的資金僅有約200億美元，遠不能滿足此一基建資金需求<sup>4</sup>。

「中國」在尋求金融體制內改革失利、國內產能過剩、區域發展不均，及大國思維蓬勃發展等內外條件充分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2013年假雅加達向外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聯結「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沿線國家，促進區域整體經濟發展及一體化；並在多邊主義外交戰略基礎上，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下稱亞投行），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融資機構，該計劃獲得發展中國家大力迴響。2015年亞投行成立迄今不過3年，已成功吸引計87個國家及地區加入，包括英、法、德等已開發國家，擊敗由日本領導，計有67個成員國的區域多邊金融機構-亞銀，目前G7國家中僅剩美國及日本尚未加入，但彼等國內也紛紛傳出催促政府加入的聲音而要求積極評估利弊，「中國」此役一舉打響了亞投行-首個由發展中國家推動及主導之區域多邊金融機構的名聲。

亞投行被視為「中國」打破歐美金融建制，創造有利自身政經發展環境之濫觴，「中國」試圖改變的國政經秩序勢必衝擊美國長期主導的金融制度與秩序，且在功能上，被外界認為與以美日為首的多邊金融機構世銀及亞銀高度重疊，而在初期引發美日對「中國」籌設亞投行動機及未來治理透明度的疑慮。亞投行既是「中國」推動多邊外交的實踐，也是國際社會評估「大國崛起」意向的觀察點，亞投行隱含的戰略目標及對「中國」整體外交大戰略的佈局及功能殊值關注。

## 二、研究目的

「中國」作為崛起之區域強權，近年積極於國際場域展現提供「公共財」之能力及意願，惟各國均因其強勢之經濟實力及積極向外輻射影響力的行為而深感不安，其中籌設亞投

---

<sup>4</sup> 維基百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查閱日期：2017年10月25日）



行之舉更被美、日等既有秩序維持者視為對現狀的挑戰而極力抵制，尤其是美國，作為長期主宰世界政經秩序的霸權，對於歐美等已開發國家「拋棄」美國，相繼加入亞投行創始國行列之舉始料未及，更加深其對「中國」意圖之疑慮。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仍企圖主導亞洲區域經濟整合而拒絕加入亞投行，並要求亞投行遵循既有規範與世銀及亞銀合作，以便制約「中國」之影響力。待川普執政後，以經貿考量佈局「中國」，對亞投行的看法也相對正面，表示在對美國有利之條件下不排除加入亞投行。長期以美國指導馬首是瞻的日本，面對國際政經情勢改變及國內經濟不振的壓力，對於加入亞投行的態度已隨美國政策調整，而由早期的強勢反對逐漸出現轉變，但如今日本與「中國」議價之籌碼已不若往日，能否爭取到優惠之加入條件仍有待觀察。對此亞投行長金立群態度開放，表示亞投行歡迎美、日等國的加入，亞投行不會成為美、「中」的問題，與世銀和亞銀也非競爭而是彼此合作、學習的關係。

作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橫跨歐亞非戰略之重要融資及貸款機構，亞投行成立也象徵著發展中國家對現狀不滿、尋求有利全球政經治理之發軔。本文試從「中國」外交戰略與佈局著手，探討亞投行在其中的角色，並簡介與分析亞投行與亞銀在職能及制度設計等方面的差異，佐以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及區域發展中大國印度對亞投行之看法與回應，以歸納亞投行對「中國」戰略的輔助角色，進一步觀察「中國」在全球政經治理扮演的轉型角色，及亞投行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供未來研究美「中」亞太地區階段性權力轉移及金融主導地位變革之參考。

##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 一、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在論文撰述中是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這樣的標準常因研究對象或研究相關議題的不同，而有途徑上的差異。論文要在確立研究方向與標準後，才能選擇適當的研究途徑。相較於研究途徑是一種研究方向、標準、甚至是如何切入議題而進行研究的程序，研究方法則是用於指導作者的資料彙集、整理、鑑定與運用的做法<sup>5</sup>。

本論文主要係研究「中國」籌設亞投行的戰略規劃，並就亞投行的發展與對國際金融環境的影響進行資料整理，試釐清「中國」在亞投行扮演的角色、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互動關係，及美、日、印等代表性國家對亞投行的立場與因應。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歷史研究途徑 (Historical Approach)」，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2013年提出亞投行倡議為起點，至2018年10月(作者本身時間規劃)為觀察之時間軸，佐以同時期政經環境變化及主要相關國家政府立場及政策進行分析比對，有系統地彙整文獻資料及最新資訊以便歸納出作者立場與結論。

「歷史研究途徑」係指以時間為主軸探討歷史事件軌跡與成因的作業過程，從一個歷史事件本身發展的軌跡中，研究與發現規律的一種方法，其目的在找出某種特定時空所發生的歷史事實、及其前因後果，或從個別歷史的因果關係之中追溯過往而得出理論性解釋的分析方法<sup>6</sup>。故外界對亞投行營運之正反評價及美、日、印等國對亞投行之立場與政策因應，均為本論文探討的範圍。

### 二、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是指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歸納及研究，而獲得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料，並針對該研究主題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系統性地整理，以歸納出結論的一種研究方法。

---

<sup>5</sup> Fred N. Kerlonger, Howard B. Lee 著，黃營彬、汪志堅編譯，《研究方法》，（臺北：新加坡南亞湯姆生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9月），頁 53

<sup>6</sup>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 165

文獻研究的重點在於透過蒐集資料，逐步驗證過去學者對某一理論、事件或是現象的看法是否與自身意見及研究對象發展之結果相左，作為本論文的新觀點或未來研究之基石，故此研究方法有助作者了解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甚而推測未來<sup>7</sup>。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針對政府機構、國內外相關之研究機構、政府間國際組織、新聞媒體報導等資料來源進行蒐集整理。資料類型包含專書、期刊、專案研究報告、研討會論文、官方統計、年鑑、調查報告、媒體新聞資料等不拘形式。蒐集管道包括網際網路資訊、電子資料庫、智庫網站，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布魯金斯學會、《問題與研究》……等。



---

<sup>7</sup> 葉至誠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民88年），頁138-156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為一線性研究，起自2013年10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假印尼提出籌設亞投行構想，終至2018年10月為觀察及資料蒐集的暫停點。由於亞投行仍持續接納會員國，且該行協定內容、投票權及貸款模式等仍處於變動階段，故作者將持續密切觀察，即時更新相關研究資料，以完善論文內容，隨著亞投行發展進程，探討其與國際政經環境的連動關係，與國際多邊金融組織的互動關係，及亞投行發起國「中國」與周邊大國美國、日本及印度的政策競合。

### 二、研究對象

本文將聚焦探討亞投行對「中國」大戰略的支持作用，透過歸納「中國」籌設亞投行的背景因素及政策目標以釐清亞投行乘載的戰略意涵與功能；在制度設計、治理模式及貸款特性等層面分析亞投行中「中國」的角色，及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互動關係；同時觀察區域多邊金融組織及區域主要國家對亞投行的政策立場與因應，以便預測亞投行對國政經環境及「中」、美金融話語權及地位的影響。

### 三、研究限制

(一) 亞投行為一發展中的多邊金融組織，其會員國、投票權分配及貸款規範等仍處於變動期，加上所屬之國政經環境為一有機體，將在各國政策引導下相應調整反饋，增加研究資料判讀及結論預測之困難度。

(二) 鑑於亞投行發展尚未成熟，且相關之研究資料、公開數據及內部文件未臻完善，在可參考之文獻資料有限下，恐侷限本研究對亞投行及未來國政經環境發展之判讀結果。

(三) 本文將觀察美、日、印等國對亞投行及「中國」戰略之回應，惟囿於作者本身語言限制，對於日文之官方資料及政策僅能透過二手翻譯進行側面了解，恐有時效之落差。

##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於緒論部分，首先簡述研究動機、途徑與方法，以便讀者了解本論文之研究框架；次章自「中國」外交戰略的起源談起，簡介「中國」外交理論與戰略發展歷程、多邊外交及南南合作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指導角色，以凸顯習近平主政下的外交特色與「中國」成立亞投行之政策背景。第三章就亞投行籌設歷程及貸款現狀進行系統化的整理，以觀察亞投行運作情形；接著探討亞投行對「中國」內政與外交的支援作用，及亞投行的制度設計以作為與既有多邊金融組織比較之基準。第四章針對亞投行迄今貸款項目進行分析，以釐清亞投行投資特性及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作用。第五章將分別探討全球已開發大國美國、日本及區域發展中大國印度對亞投行之立場，並提出亞投行對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簡述外界迄今對亞投行的質疑與挑戰。最後在第六章提出作者的結論，對未來國際關係及美中經貿發展進行預判，並將本論文尚未解答及可供未來深入研究之問題領域摘整供參。本論文區分為六章，茲陳列章節安排如次：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第二章 「中國」外交戰略的緣起與發展

#### 第一節 「中國」外交戰略回顧

#### 第二節 「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多邊主義與南南合作

#### 第三節 習近平的外交思想與政策

#### 第四節 小結

### 第三章 亞投行簡介

#### 第一節 亞投行的成立與發展

#### 第二節 「中國」籌設亞投行的動機與戰略意涵

#### 第三節 亞投行制度簡介與比較

#### 第四節 小結

### 第四章 亞投行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

#### 第一節 亞投行貸款特性分析

#### 第二節 亞投行助力「一帶一路」交通建設

#### 第三節 亞投行助力「一帶一路」能源建設

#### 第四節 小結

### 第五章 亞投行對國政經秩序的影響

#### 第一節 美國、日本與印度對亞投行的立場與因應

#### 第二節 亞投行對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

#### 第三節 亞投行的挑戰

#### 第四節 小結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國際關係經貿化

#### 第二節 臺灣對亞投行的因應之道

####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 第二章 「中國」外交戰略的緣起與發展

「中國」自共產黨建政以來，國際觀及外交政策延續性高，自毛澤東開始，即使歷經領導人更迭，仍維持一脈相承的「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南南合作）」外交原則，逐步依國際環境發展具「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在毛澤東的國際觀及外交思維領導下，「中國」秉持社會主義路線，爭取新興及發展中國家支持，形成南方集團與已開發國家抗衡，並居中扮演南方國家代言人角色推動國政經秩序改革，創造利於「中國」發展之條件與環境。「中國」外交作為包括透過雙、多邊機制推動經貿、政治外交，既兼顧內部改革發展也不放棄援外推動南南合作；利用國內經濟成長的果實向外輸出「中國」崛起的影響力，實現「新安全觀」及「中國」價值觀。近年習近平推動「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戰略，即是「中國」外交戰略的承襲及實現。綜觀「中國」外交戰略可概分為以下階段：1950年代「一邊倒<sup>8</sup>」向蘇聯的外交策略、1960年代「反帝反修<sup>9</sup>」的兩條線策略、1970年代「聯美制蘇」的「一條線」、「一大片<sup>10</sup>」策略，以及1980年代迄今的「反霸權主義」策略，反映出各階段「中國」的國際思維及外交指導原則。

---

<sup>8</sup> 毛澤東於1949年6月30日公布「一邊倒」的方針，意指堅定地支持共產國家陣營，反對帝國主義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視資本主義陣營為敵人，並聯合共產陣營對抗他們。此政策奠定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維基百科〈一邊倒〉，<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一邊倒>（查閱日期：2018年7月22日）

<sup>9</sup> 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蘇聯追求蘇美合作統治世界，力圖控制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各國，可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卻不隨蘇聯的指揮棒轉，為維護「中國」的權益，在盡可能保持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和不破裂中蘇友誼及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以「堅持原則，後發制人；堅持鬥爭，留有餘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策略方針，同赫魯曉夫集團展開了激烈的控制與反控制鬥爭。「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毛澤東「反帝反修」外交戰略的內涵及其實踐效應，<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138903/141370/9376782.html>（查閱日期：2018年7月22日）

<sup>10</sup> 「一條線」是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都在這條線上，「一大片」則是指這條線周圍的所有的國家。「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澤東新的國際戰略，其主旨就是要團結這「一條線」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國家，即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中國」共產黨新聞，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演變，<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0190/70194/5233848.html>（查閱日期：2018年7月22日）

## 第一節 「中國」外交戰略回顧

「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是「中國」大戰略的奠基者，也是「中國」世界觀及處理涉外事務原則的確立者。毛澤東於1950年代提出「一邊倒」政策有其時代背景，身處美蘇兩大強權領導的資本與共產主義兩極化格局，國際社會容不下「中間派」，堅信社會主義是「中國」發展唯一道路的毛澤東，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線，為自身安全與發展尋求保障，並提出聯蘇抗美的「一邊倒」戰略，在外交與內政上以蘇聯馬首是瞻，共抗美國民主同盟。然對外關係方面，毛澤東仍不放棄營造友善、利於「中國」發展的環境，透過團結社會主義、亞非、新興及愛好和平的國家尋求支持。

1960年代因蘇聯強推霸權主義導致「中」蘇聯盟破裂，「中國」陷入同時與美蘇對抗腹背受敵的困境，毛澤東於是提出「反帝反修」戰略，公開表示：「在反對修正主義問題上，我們的矛頭主要對准赫魯雪夫；在反對帝國主義問題上，我們集中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不放棄將「中國」外交重點置於亞、非、拉國家，積極爭取「中間地帶<sup>11</sup>」國家的支持，以建立國際「反帝反修」的統一戰線。時任「中國」國家總理的周恩來為化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共產政權的疑慮，在1953年會見印度代表團時首度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sup>12</sup>」，強調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等原則處理對外關係；並於1955年第一次假印尼萬隆舉行之亞非會議中再度重申，提出「亞非國家應求同存異、團結反帝」等口號，號召第三世界國家共同抵制美國與蘇聯的殖民主義，會議中達成之第三世界團結一致共識遂成為後來「萬隆精神<sup>13</sup>」的中心思想。

毛澤東根據所觀察之國際體系及各國經濟發展狀態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三個世界」概分為：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霸權是第一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

---

<sup>11</sup> 美蘇之外的國家都屬中間地帶；中間地帶按照經濟發達與不發達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非拉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75

<sup>12</sup> 維基百科〈和平共處五項原則〉，<https://zh.wikipedia.org/wiki/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查閱日期：2018年7月22日）

<sup>13</sup> 萬隆精神，於1955年由亞非國家假印尼萬隆召開會議中提出，揭開了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爭取國家獨立和主權、謀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歷史新篇章。會議在「中國」、印度、緬甸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提出了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即萬隆精神。維基百科〈萬隆會議〉，<https://zh.wikipedia.org/wiki/萬隆會議>（查閱日期：2018年7月22日）



如英、法、德、日、加拿大、澳洲等國是第二世界，餘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發展中的國家則是第三世界<sup>14</sup>。根據這個戰略思想，「中國」政府明確地把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合作視為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用以推展與非洲、拉丁美洲及東南亞等國的經貿外交。此外，毛澤東歸類「中國」為第三世界國家之舉，確立了「中國」的國家認同及外交佈局。

毛澤東的外交策略大致採取與主要大國抗衡的姿態，使「中國」的外交處境相對孤立；而「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則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改革開放」路線，在發展國內經濟的同時也開始與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交往，藉由與政府間及非政府組織(NGO)的聯繫，帶領「中國」逐漸走出孤立<sup>15</sup>。

1971年在亞非等新興國家支持下，「中國」加入了聯合國，堪稱其外交史上的一大勝利，也讓「中國」更加堅信「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發展」的外交戰略，然面對由西方已開發國家創始、領導，制度獨厚西方國家的聯合國及多邊建制，「中國」居中逐漸萌生改變、建立國際政經新秩序的念頭。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上指出：「建立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基礎上的舊秩序，使得貧國愈貧，富國愈富，貧國和富國的差距越來越大，這種舊的經濟秩序是發展中國家解放和進步的最大障礙<sup>16</sup>」，主張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並強調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參與決定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方面的大事。1988年他又提出，現在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來解決南北問題，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以使它同國際經濟新秩序相適應<sup>17</sup>。可見「中國」對已開發國家主導的多邊機制已由原本的充滿敵意轉而有效參與，甚至積極尋求改變的途徑。

此外，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在三個世界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東西北南問題」。鄧小平認為，解決南北問題有兩條基本途徑：「一條是南北對話，

---

<sup>14</sup> 維基百科〈三個世界理論〉，[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個世界理論\\_\(毛澤東\)](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個世界理論_(毛澤東))（查閱日期：2018年7月22日）

<sup>15</sup> 初國華，張昌吉，後冷戰時期中共的對外政略：對國際社會與臺灣的意義，《建國科大學報》，民國98年，頁112

<sup>16</sup> 「中國」共產黨新聞，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論要，<http://cpc.people.com.cn/BIG5/68742/69115/69120/5623686.html>（查閱日期：2018年7月22日）

<sup>17</sup> 同前註

解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縮小兩者之間的距離；另一條是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之間加強經濟、貿易交往，聯合起來共同反對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促進自身的發展<sup>18</sup>。鄧小平在任期間積極倡導南南合作，促進「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間的關係。1982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及利亞政府代表團時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這個提法好，應該給發明者一枚勳章。」可見他對南南合作的立場與態度。鄧小平認為：「第三世界國家要鞏固國家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僅僅依靠南北對話與合作是不行的，還必須開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國家資源豐富，能互通有無，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合作，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基礎相近，又面臨共同的挑戰，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窮幫窮，讓南南合作有堅實的政治基礎<sup>19</sup>」。他的南南合作思想對「中國」推動南南合作戰略、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及促進自身的經濟發展都有重大的意義，也是「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開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層面交流，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理論基礎。

歷經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中國」綜合國力日強，1997年後，「中國」對外交往的具體作為包括與世界主要大國建立「夥伴關係」或「戰略夥伴關係」。「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開始推動大國外交，與世界各主要國家如美國、蘇俄、歐盟等國建立各類型的「夥伴外交」，一方面考量制約美國的霸權力量，另一方面則是加速推動多極體系(multipolar)國際格局的實現。因此可說「中國」推動夥伴外交是其促進多極體系形成的助力與訊號，也是促進國際權力結構轉型的意圖與力量<sup>20</sup>。

江澤民在聯合第三世界國家的基礎上，對東南亞國家推動「睦鄰外交」，一則化解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一則用以突破西方國家的「民主封鎖」。對「中國」來說，東南亞不啻是個充滿機會的地區，除了具經濟潛力，歷史上與「中國」有淵源，又掌握「中國」周邊海域運輸之經濟命脈，且僑居在這些國家的華僑具高度影響力；更重要的是，東南亞可視為美國圍堵「中國」戰略中關鍵但相較脆弱的環節。因此，自1997年以來，「中國」不僅積極提升並維持其在該地區地位<sup>21</sup>，突破美國與「中國」鄰邦間透過雙邊安全機制形成的包

---

<sup>18</sup> 同前註

<sup>19</sup> 同前註

<sup>20</sup> Thomas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1 (Summer 2006.), p.132.

<sup>21</sup> Rommel C. Banlaoi,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p.103.

圍鏈，以壓制美國區域軍事優勢，更希望透過外交、經濟與軍事等多元化往來，化解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主觀感受<sup>22</sup>。

在肯定世界朝多極化發展和經濟走向全球化的基礎上，江澤民在第九次駐外使節會議上對外交工作做出了以下幾點闡釋，他指出：「要處理好同世界各大國的關係，努力推多進極化趨勢的發展」；「要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繼續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工作，堅持睦鄰友好保持良好的周邊環境對我們的發展至關重要」；「要進一步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要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由此可看出江澤民外交工作的側重與國際觀的認知與「中國」前幾代領導人無異，江所提倡的「睦鄰外交」也是「營造和平穩定發展環境」、「團結第三世界國家」等概念的延伸。在具體作法上，江澤民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報告中提示：「我們將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以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擴大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妥善解決分歧」；「我們將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我們將繼續增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強相互幫助和支持，拓寬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效果」；「我們將繼續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及區域性組織中發揮作用，支持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我們將繼續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同各國各地區政黨和政治組織發展交流和合作<sup>23</sup>」。

繼1971年陸續加入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後，「中國」對多邊外交及國際建制的看法逐漸轉變，由抵制漸走向接納。「中國」從事多邊外交主要是凸顯「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區域以及全球的重要性，對「中國」而言，北京服膺「多邊主義」既可營造國家的國際聲譽也可改善外界對「中國威脅論」的觀感<sup>24</sup>。江澤民善用國際機制推廣大國外交，使之能服務於「中國」的戰略目標，具體實例包括：利用聯合國安理會協調機制處理南亞核危機、聯合其他國家反對美國單邊主義強勢介入科索沃危機等，除捍衛了聯合國的合法基礎及權威性，也

---

<sup>22</sup>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180; Thomas Lum et al,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2008), p.2.

<sup>23</sup>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江澤明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03-205

<sup>24</sup>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20

讓「中國」的外交理念及大國形象得到了宣揚。除此之外，江澤民也善於創造國際機制來擴大「中國」的影響力，如在解決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邊界糾紛上，「中國」於1996年聯合俄羅斯、哈薩克等國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sup>25</sup>上合組織除有利「中國」打擊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外，對安定西部邊疆更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另透過此合作機制在歐亞中心平衡美國擴張的勢力，也有效提高了「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的談判籌碼。上合組織可視為「中國」創建多邊機制的濫觴，對研究「中國」提供公共財、推廣「新安全觀」及籌設多邊機制亟具參考價值。

與大國外交相比，「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提出「和諧世界」作為指導「中國」對外工作和處理國際關係的新方針。胡錦濤在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理念和江澤民的「新安全觀」以及「國際關係民主化」等基礎上發展外交道路，於2005年9月15日聯合國成立60周年的首腦會議中首度提出「和諧世界」概念，並發表主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之談話<sup>26</sup>。「和諧世界」並非天外飛來的全新思想，而是「中國」對周恩來假萬隆會議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傳承與深化，其內涵包括「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等核心思想，及江澤民提出的「新安全觀<sup>26</sup>」（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與「國際關係民主化」（主張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人民做主，國際上的事情要由各國平等協商，全球性的挑戰要由各國合作應對）的深化，體現「中國」外交心態的積極變化<sup>27</sup>。

「和諧世界」繼承了「中國」外交的傳統理論與精神，體現在外交工作的幾個面向，一是在國際舞臺上推行國際關係民主化，強調不同制度和和平共處、發展模式多樣自主、文明成果交流共享等理念，如「中國」積極參加八國集團（G8）南北對話會議，並多次在會議上呼籲加強南北對話與合作，及已開發國家要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技術援助等。二是在國際組織宗旨、體制、規則、程序、規範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議；在解決國際爭端部分，提出有關意見及合理的解決方案，隨著「中國」影響力日增，「中國」對國際組織及國際爭端

---

<sup>25</sup> 鄭宇碩，十七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二十一世紀評論》，頁15-16

<sup>26</sup>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35卷第2期，2004年7月，頁3-32

<sup>27</sup> 施子中，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中共外交戰略之轉變，《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1期，頁10

扮演的角色漸趨關鍵。三是在碰到與國家利益有關的事務時，「中國」態度更為堅定，據理力爭，以尋求雙贏。

在發展對外關係方面，胡錦濤於中共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在此基礎上，胡錦濤闡釋了「中國」多層次外交的策略：其一，在與已開發國家發展關係方面，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其二，在對待周邊國家方面，「中國」堅持互利互惠的鄰國政策，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其三，在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方面，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永遠做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其四，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方面，將參與多邊事務，支持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國際組織發揮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sup>28</sup>。

隨著「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就任，「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但沒有式微，反而再度被發揚，向民主國家證明了它的理論價值及實用性。習近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遠期目標，其眼界及抱負與前幾代領導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任內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及亞投行，分從地緣戰略角度及國政經建制著眼，向外輸出「中國」經濟崛起的果實，發揮「大國外交」影響力，既團結南方國家及新興經濟體，也吸引已開發國家參與，足見其外交佈局中南南合作及多邊主義的色彩；綜觀中共外交戰略及舉措，核心不離南南合作理論，模式不脫多邊主義範疇，故接續將探討「中國」南南合作與多邊主義的發展歷程，並以習近平推動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作為檢驗「中國」外交理論的標的。

---

<sup>28</sup> 李海龍，十八大報告外交戰略新思路分析，《中共山西省直機關黨校學報》，頁5

## 第二節 「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多邊主義與南南合作

### 一、「中國」多邊外交的發展歷程

多邊外交是「中國」融入世界格局，推動大國外交的必然選擇，它在「中國」外交上的地位與重要性逐年提升，其功效也隨著世界多極化與全球治理趨勢的來臨而更加彰顯。多邊主義是多邊外交的理論核心，隨著國際組織的增加，「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和實踐也相應增多，使其開始學習多邊主義的規範及內涵。透過規範的內化，「中國」對世界觀的看法也逐漸改變，認知到多邊主義是全球化條件下國際關係發展的新潮流，而「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不但不能置身事外，更應抓住機會努力推動多邊外交。隨著「中國」整體國力的提升，越來越重視透過多邊外交發揮「中國」特色的大國作用，在維護自身權益的同時，向外輸出「中國」意象及影響力，化解外界對「中國威脅論」的負面觀感。「中國」對多邊外交的適用是長期經驗的觀察與累積，是對國際環境與國際系統的趨勢與本質作全面性的評估而採取的戰略選擇，而非僅是對外界刺激做出的短期回應<sup>29</sup>。

就單位層次言，多邊主義是主權國家的一種外交取向，它與單邊主義、雙邊主義等概念屬於同一範疇，而屬於國家處理國際關係的行為模式，故基本上等同於「多邊外交」；但若是從體系層次言，則是一種國際互動的方式，滲透於區域主義和全球主義的範疇內，又可以區分為地區性多邊主義與全球性多邊主義<sup>30</sup>。「中國」與傳統歐美國家對於多邊主義的立足點與視角不盡相同，因而產生了不同戰略意涵的多邊治理觀。在西方理論中的多邊主義，具有權力讓渡和遵循規範的特性，然在「中國」版的多邊主義內涵及實踐中卻被改寫且選擇性接受，「中國」因歷史教訓對多邊主義心態較為謹慎保守，僅在功能性議題與經貿領域配合多邊機制的權威，失去了西方原始多邊主義的內涵。多邊主義在「中國」外交實踐中，隱

---

<sup>29</sup> Yong Deng and Wang Fei-Ling, ed.,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ryland, U.S.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16

<sup>30</sup> 約翰·魯杰著，蘇長和等譯，多邊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6-12。秦亞青，多邊主義研究：理論與方法，《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0期(2001年10月)，頁9

含「多邊共同維護主權<sup>31</sup>」的概念，而將多邊主義與制度視為推動多極化世界的方式<sup>32</sup>，從權力觀點看待一個制度化的國際秩序所能抑制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因此「中國」雖持續參與1945年來的制度現狀，並積極融入現有國際體系，但也從中表達出了重新改寫規則的意圖。亞投行的成立，即是「中國」試圖將制度建立融入其外交戰略與全球政策的嘗試，也被視為改變以美國為國際秩序中心的問路石<sup>33</sup>。

「中國」多邊外交發展概以進入聯合國前後作為粗略的區分。「中國」進入聯合國前，多邊外交發展尚處於萌芽階段。中共建政之初，基於國際體系的冷戰格局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的敵視與封鎖，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長期以「雙邊外交」為主，特別是與蘇聯間的雙邊外交最為密切，縱有多邊外交其範圍也很有限，多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要交往對象。直至「中國」進入聯合國，成為安理會一員，始將聯合國作為開展與南方國家多邊外交的主要舞臺。1978年12月，「中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了改革開放總路線，明確外交的根本任務是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因而改變了對於聯合國等國際機制的認知與互動。例如1981年「中國」投票支持延長聯合國在賽普勒斯的維和期限，改變了以往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立場<sup>34</sup>。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的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之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首次明確指出：「『中國』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中國』廣泛參加各種國際組織，開展積極的多邊外交活動，努力增進各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sup>35</sup>」。

1997年至2001年間，「中國」對地區多邊組織的認知從懷疑演進到不確定再到支持。十四大報告強調：「實行對外開放是改革和建設必不可少的，應當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包括

---

<sup>31</sup> 邱坤玄，「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十一卷第四期，2010年10月，頁28。

<sup>32</sup> Xiaoming Zang, "Multipolarity and Multilateralism as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in Zhongqi Pan ed., "Conceptual Gaps in China-EU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76-177.

<sup>33</sup> Evan A. Feigenbaum, "China and the World: Dealing With a Reluctan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7), p. 33.

<sup>34</sup> Jianwei Wang, "Managing Conflict: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 Democrac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Yong Deng and Fer Ling Wang eds., "In the Eye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75. 轉引自王明進，「中國」對外邊外交的認識與參與，《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5期（2004年5月），頁43-44。

<sup>35</sup> 新華網，第六屆全國人大歷次會議，[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2/20/content\\_283407\\_3.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2/20/content_283407_3.htm)（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封閉只能導致落後」。十五大報告亦指出：「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依據這樣的開放思想，經過短暫的調整，「中國」的多邊外交重新脫胎換骨，進入了建設性的外交實務階段。這種建設性的多邊外交主要體現在對國際組織的認可度和參與度，及表現在對周邊地區事務的廣泛參與和積極塑造。1990年代「中國」陸續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與東協區域論壇(ARF)等非正式的多邊機制，逐步適應、轉化冷戰思維以融入制度化的國際建制，對多邊機制的疑慮也逐漸改觀，並嘗試透過多邊外交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建構合作與安全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等，促進共同安全與經濟發展，進而參與地區和全球治理。

在「大國是重點、周邊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外交是舞臺」的總體外交方針下，2004年9月，「中國」第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要主動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積極在聯合國等重要國際組織中發揮作用<sup>36</sup>」；2005年3月「中國」召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溫家寶總理發表之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要「積極倡導多邊主義<sup>37</sup>」；2007年10月，「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在共產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將繼續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sup>38</sup>」，由此可看出多邊外交在「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逐年提升，「中國」對參與多邊機制的態度也由原先制度的「遵從者」過渡為「改革者」與「建構者」。

從多邊外交的合作範圍來看，包括全球性的、區域性的和跨區域性的機制。在全球性的多邊外交機制層面，聯合國是「中國」多邊外交在全球性層面體現得最典型的。「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指出：「要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聯合國作為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國際合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從多邊外交的合作內容來看，其內涵包含了政治、經濟、安全、

---

<sup>36</sup> 新華網，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Sep/668376.htm>（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sup>37</sup> 新華網，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http://www.xxbei.com/article/526.html>（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sup>38</sup>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49



文化等各個方面。在政治領域，多邊外交已從傳統的高階政治領域擴大到非傳統的低階政治領域，經濟交往與合作已成為引導和促進「中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重要支柱<sup>39</sup>。

在多邊合作內容延展方面，上海合作組織(SCO)的成立與發展是一個典型案例，該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機制是一個討論和解決邊境地區加強軍事信任與裁軍的談判進程的組織，而「上海合作組織」的宗旨是：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鼓勵各成員國在政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環保及其它領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於維護和保障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積極參與現有的國際體系，以建設性的姿態循序漸進地對其加以改造，才能為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做出積極貢獻。因此「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將自己融入國際體系，積極參與多邊外交，同時在參與過程中，不斷地透過多邊外交在國際事務中尋求話語權，致力於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sup>40</sup>。

在「中國」的多邊外交實踐中，縮小南北差距、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自主發展能力，以促進發展中國家內部穩定和地區和平也是「中國」的重要目標。「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2016年1月16日亞投行開業儀式暨理事和董事會成立大會上明確指出，亞投行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及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建設性舉動，不單展示了「中國」在新形勢下推進多邊外交的建設性努力，也是習近平合作共贏多邊外交思想從理論到實踐的重要成果。2005年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此後，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政治期待日益高漲。在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新一代領導層看來，提振全球經濟，推動世界和區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有效，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最重要的國際責任，也是「中國」多邊外交的首要努力方向，亞投行作為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便是這樣的產物<sup>41</sup>。

## 二、「中國」南南合作的發展與轉化

---

<sup>39</sup> 王耀東、張旭東，「中國」多邊外交的發展與思考，《黨政論壇》，2011年9月號，頁41。

<sup>40</sup> 同前註

<sup>41</sup> 壹讀，亞投行開業：習近平多邊外交思想的實踐里程碑，<https://read01.com/GBB2R4.html>（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回顧「中國」外交政策與官方指導文件可發現，維繫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始終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其重要性也一再被提起。從早期毛澤東時代的「三個世界」理論，到近代的「發展中國家是基礎」，「中國」不斷實踐與創新外交理論來促進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關係。基於相似的政經地位及對改變國際環境的共識，「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存在共同的利益，也成為南南合作最堅實的基礎。「中國」深信發展中國家其中一方的強大，必然形成對另一方的支持，「中國」開展南南合作，不僅使受援國獲益，經濟得到發展，反之「中國」也會從中獲利，得到政治及經濟資源的挹注。因此「中國」長期以發展中國家代言人自詡，透過援外政策、建立區域論壇及共同體等形式結合發展中國家，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國際影響力及話語權大為提升，也使發展中國家問題及權益漸由國際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心。

傳統南南合作理念與模式是在美蘇對峙的國際背景下發展而成，當時發展中國家認為，鞏固獨立和謀求發展的最佳政策選擇就是發展中國家自身的團結合作，如此方能在美蘇兩大國冷戰中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第三條道路」。南南合作的精神和原則最早由「中國」和印度兩國在萬隆會議提出。1955年4月，印度、緬甸、斯里蘭卡、印尼和巴基斯坦等五國發起萬隆會議，「中國」和其他亞非發展中國家應邀參加。在此次會議上，與會各國領導人就亞非國家共同攸關利益之問題進行討論，「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獲得一致認同，將作為日後處理國家間關係的指導原則。在「中」、印的積極推動下，與會的發展中國家決定在南北對話中，必要時採取集體行動及一致的態度，制訂共同政策或在國際會談中事先進行磋商，以便盡可能促進它們共同的利益，該會議大力提倡發展中國家團結與合作的精神，後被稱為「萬隆精神」，而會上形成的亞非國家集團也是後來「不結盟」運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先河。1960年代不結盟運動以及七十七國集團成立，使南南合作開始進入制度化的新階段，也更加重視加強彼此間的經濟合作和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相較傳統南南合作建立在反帝、反殖民和反霸權基礎上，後期南南合作是以經濟發展的互利共贏為基石，以提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整體權重為目標，為新南南合作注入了更多共謀發展、合作共贏的新元素<sup>42</sup>。

簡而言之，發展中國家自覺在全球南北矛盾和南弱北強力量懸殊的形勢下，唯有透過團結才能求得發展與維護國家利益，「南南聯合自強」的戰略思想也因此逐漸擴散而進一步獲得實踐。1970年代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尤以聯合國為主要論

---

<sup>42</sup> 孫靚瑩、邱昌情，「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的南南合作：路徑與前景，頁1-2

壇，且成功地在1974年聯合國憲章中增加了《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其中提及要消除新殖民主義，並主張「各開發中國家應當加強彼此間的經濟合作和擴大相互貿易，藉以加速他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隨後在聯合國發展計畫署下設置「南南合作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以推動相關工作，倡導南方國家在尊重國家主權獨立、平等、不干涉國內政治與互惠的前提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等領域合作<sup>43</sup>。

在南南合作的發展進程中，發展中國家透過聯合自強，區域、次區域、跨區域的合作方興未艾，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已成為國際社會及推動國際秩序轉型不可忽視的第三種力量，其中「中國」一直是主要的推動者和實踐家<sup>44</sup>，其和發展中國家共建的國際機制包括中非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中阿合作論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另習近平21世紀提出的「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戰略亦是「中國」在當今新型全球治理下，全方位開展對外經濟合作，深化與周邊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在成為亞太區域經濟增長核心、周邊大國競爭加劇以及地區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內涵涉及「中國」周邊外交、經濟合作、區域治理、互聯互通建設等多元領域，突破了傳統南南合作僅限於經貿互助的固有形式，可視為新時期「中國」推動南南合作的重要外交創新與實踐<sup>45</sup>。「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就曾表示：「為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為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sup>46</sup>。」2015年3月28日，中共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等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中進一步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包括中亞、西亞、北非、中東歐、

---

<sup>43</sup> “What I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ttp://www.arab-ecis.unsouthsouth.org/about/what-is-south-south-cooperation/> (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sup>44</sup> 孫靚瑩、邱昌情，「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的南南合作：路徑與前景，頁2

<sup>45</sup> 同前註

<sup>46</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習主席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大學發表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演講，[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1074151.shtml](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1074151.shtml)。(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南亞、東南亞以及大洋洲等區域大部分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加強與南方國家合作之外交原則不謀而合。

亞投行是「中國」落實「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經濟支點，也是促進國政經改革，實踐南方國家共同利益的重要國際機制。舉例來說，亞投行股權分配域內國家占比達75%，域外國家僅佔25%，即是為保障發展中國家的規則制定權及貸款權益，由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商定亞投行的投資融資規則，已顛覆了既有金融機制下，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已開發國家控制下的格局。亞投行的建立推動了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進程，也讓世界感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力。二戰後，美國建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主導地位，使之成為全球貨幣，後又透過世界銀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性組織鞏固美國對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儘管隨著日、德等經濟體發展，導致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然卻未動搖美國主導國際金融秩序。今發展中國家和世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特別是近10年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的不斷快速發展，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以美國利益為核心、以G7為主角的國際金融結構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訴求與需要，及對金融秩序正義與合理化的殷切期望，因此，「中國」籌設的亞投行不但體現了南南合作的精髓，也促進了區域經濟整合及國際金融秩序的改革。

### 第三節 習近平的外交思想與政策

「中國」當前領導人習近平承襲毛澤東思想及前幾代領導人的外交理論與原則，面對促進「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所需動能、調整內部結構性問題、化解外界對「中國」崛起的猜忌等多重考量，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為號召，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內涵包括「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等<sup>47</sup>，把「中國夢」具象化，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識，也讓世界更清楚了解「中國」崛起的意象。「中國夢」對內可凝聚「中國」人民的自信心，對外可宣示「中國」的發展藍圖與目標；「中國夢」寄託了歷代領導人的殷切盼望，冀能打破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零和關係的宿命，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sup>48</sup>。因此「中國夢」可謂涵蓋了習近平對「中國」發展及對未來國際社會理想狀態的美好想像。

自習近平任「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以來，外部存在周邊海洋主權紛爭、北韓核危機，美日防堵擴大等諸多挑戰，故外交政策重在「有所作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相應提出「積極進取」外交，置重點於積極主動地發揮負責任的大國作用，依據「大國、周邊、開發中、多邊」等四個面向佈局，透過「結誼大國、穩固周邊、協同多方、孤立對手」等靈活策略，訴求互利雙贏，向外輸出經濟軟實力以謀和平之國際空間助內部持續發展，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期戰略目標，及最終實現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程目標<sup>49</sup>。

「大國關係」長期是「中國」整體外交佈局的關鍵，更是其戰略中的頂層結構。2010年5月時任「中國」國務委員的戴秉國假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首度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一詞，表示「中」美應當「開創全球化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sup>50</sup>」。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已開發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

---

<sup>47</sup> 新華網，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5434.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5434.htm)（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sup>48</sup> 杜玲玉，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13卷第3期，頁63

<sup>49</sup> 中共年報2014，《中共研究雜誌社》，2014年4月1日，頁4-1~4-5

<sup>50</sup> 新華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由來，[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6/06/c\\_116064614.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6/06/c_116064614.htm)（查閱日期：2019年1月22日）。

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sup>51</sup>」。不僅將「新型大國關係」列入「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更將大國關係的內涵擴充，泛指「中國」與所有已開發國家的關係，而非限於「中」美之間。2013年3月習近平以「中國」領導人身份首次出訪，第一站前往了俄羅斯，在其首都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了《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其中提到：「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各國人民應該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sup>52</sup>」。習近平的「新型國際關係」在「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上擴大解釋，除適用於「中國」與所有已開發或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外，更強調公平正義與合作共贏，說明了「中國」推動國政經秩序改革的旺盛企圖與努力方向。

「新型國際關係」是相對於舊型國際關係的概念。所謂舊型國際關係是指以西方主權國家為主體，帶強權政治色彩的國際關係，在此國際關係中，競爭是常態，縱使國家間有合作，仍難脫競爭的本質。如同現有的國際體系和秩序，因為西方已開發國家掌握了關鍵技術與規則制定權，使其在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時往往能獲得更多且明顯具優勢的利益，而使合作雙方難達到共贏，此模式便是「中國」意圖改變及摒棄的<sup>53</sup>。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表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內涵包括：一、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二、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三、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四、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五、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sup>54</sup>」。由於全球化時代來臨，在問題無國界的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分

---

<sup>51</sup> 同上

<sup>52</sup>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http://cpc.people.com.cn/xuexi/BIG5/n/2015/0721/c397563-27337993.html>（查閱日期：2019年1月22日）

<sup>53</sup>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新型國際關係「新」在哪裡，<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416/c40531-29927502.html>（查閱日期：2019年1月22日）

<sup>54</sup>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58-59頁

割的特性更為明顯，為「中國」方案的選項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也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理念提供了充份發展的環境。

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假紐約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發表重要講話：「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顯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已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主張，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連結「中國夢」與世界夢的有機成分，將幫助「中國」實現與世界共贏的願景藍圖<sup>55</sup>，這是習近平「中國」大戰略與外交理念的思想源頭，進而促成了「一帶一路」戰略與亞投行的產生。

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召開任內第一次周邊外交工作會議，確定了未來5-10年周邊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針與戰略目標：在經貿周邊的戰略指導下，「中國」周邊外交將整合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等次地區，強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共同利益，透過互聯互通基礎建設，形成多層次之夥伴關係，鞏固東亞區域秩序主導角色。為化解周邊國家疑慮，「中國」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富鄰」精神，體現「親、誠、惠、容」等理念，在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基礎上，推動周邊外交惠及周邊國家，以實現共同發展<sup>56</sup>。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企業領袖峰會上強調，亞太經濟一體化極為迫切，他呼籲透過包括硬體、軟體與人員的互聯互通建設，創造各方共贏的亞太夥伴關係，實現「中國夢」的區域版本「亞太夢」<sup>57</sup>。習近平除了在周邊國家推動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對促進與發展中國家關係也不遺餘力，更相應提出「義利觀」概念，以回擊西方國家提出的「新殖民主義」負面評論。習近平一方面強調從經濟、技術、資金、人員等方面力所能及地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同時利用國際機制的力量，攜手其他新興經濟體，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聲音，呼應「命運共同體」之說。2017年2月10日，聯合國經社發展委員會第55屆會議協商一致通過「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的社會層面」決議，呼籲「國

---

<sup>55</sup> 同上

<sup>56</sup> 人民網，習近平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8/1017/c64094-30345410.html>（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sup>57</sup> 謝瓊竹、陳秀蘭、盧素梅，習近平：共建互聯互通亞太夢，2014年11月10日，旺報A3版（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際社會本著合作共贏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加強對非洲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習近平的外交理念也正式被寫入聯合國決議<sup>58</sup>。

承上，習近平的外交戰略可概分為一個夢（「中國夢」）、二條路（「一帶一路」）及三個支柱（中美關係、周邊外交及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在「中國夢」的思考下，「中國」的外交應以「經濟外交」為主軸，透過「經濟外交」作為，對周邊國家大力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一帶一路」經濟建設，及附屬金融機構「絲路基金」與「亞投行」，以實踐習近平「中國夢」的區域版本<sup>59</sup>，同時呼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內涵：突出互利共贏、追求公平正義、弘揚中華文化、提供公共產品、宣導新型義利觀、承擔國際責任。因此在「中國夢」的概念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呈現不同於革命外交(1949-1979年)和發展外交(1979-2009年)的面貌，展現其尊嚴外交特質，習近平把鞏固和平發展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作為外交的根本目標，強調國際社會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應然作為，「中國」的外交角色也從國際體系和秩序的「建設性參與者」轉向了「積極的改革者<sup>60</sup>」。



---

<sup>58</sup> 共產黨員網，十九大關鍵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http://news.12371.cn/2017/12/26/ARTI1514243907561226.shtml>（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sup>59</sup> 黃奎博，「一帶一路」-「中國」的「亞太夢」，《中共研究》，第49卷第2期(2015年2月)，頁77-81

<sup>60</sup> 侯俊榮，習近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研究(2012-2015)，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中華民國105年6月，頁54



## 第四節 小結

「大國外交」一詞自1990年代後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要路線，除了顯示改革開放後「中國」在經濟上強勁發展的信心外，也意味著「中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下的重新定位。

「中國」「大國外交」的發展路線歷經了江澤民、胡錦濤，直至今日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其外交原則仍延續「不結盟，永不爭霸、永不稱霸」、「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外交」路線，在外交佈局中更強調「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戰略；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及國際環境對「中國威脅論」的不善氛圍，習近平在發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上特別注重營造和平的周邊環境以延續「中國」發展契機，並提出了「命運共同體」、「義利觀」及「新型大國關係」等外交概念，持續透過雙、多邊機制團結南方國家，輸出經濟外交，以擴大改革不利南方國家發展的政經環境。

習近平任「中國」領導人以來，對國際體系、機構和規則採取了一種混合的應對方式，既包含了共產黨執政早期的思想，即對西方的憎恨和不滿所產生的修正主義意識形態，又涵蓋了鄧小平時期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賴和逐漸增長的對國際機構和規則的擁護；還包括在「中國」更加強大和自信的新時期下，有選擇地參加現行國際機制或者建立能與之抗衡的新的國際機構。在參與現行國際機制方面，「中國」經歷了從消極被動、觀望到積極主動的轉變。冷戰結束初期，「中國」把國際機制看作帝國主義爭權奪利的工具，故長期偏好參與雙邊或非正式機制，直至加入聯合國，發現多邊外交及機制對國際環境的影響力量，方開始積極適應和學習並運用於外交領域；「中國」把多邊外交視為實現「大國外交」的重要途徑，並透過多邊外交更加有效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及改革目標。

多邊外交是「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必然選擇，它在「中國」外交全局中佔有重要地位。2013年，習近平在中亞和東南亞訪問時，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把建設「一帶一路」置於調整區域經濟結構三大任務之首，「中國」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加強互聯互通建設，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設立絲路基金，廣泛開展經貿合作，紮實推進重點項目建設，以點帶面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合作與對接、共同參與，共同繁榮。「一帶一路」既是「中國」政府完善

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重大舉措，也對推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促進與亞歐乃至世界經濟合作具有深遠意義<sup>61</sup>。

「一帶一路」建設是南南合作的實踐，「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將成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合作的重要平臺，2017年5月，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指出：「新時期加強南南合作，需要在機制建設方面加強投入，探討建立南南合作新機制，而『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個觀念的具體體現」。「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旨在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南南合作由於傳統國際合作機制影響而長期處於邊緣位置的不利狀態。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融資機構，亞投行也是「中國」實踐南南合作及多邊外交的顯例。聯合國大會南南合作高級別委員會主席、孟加拉常駐聯合國代表莫曼（A.K. Abdul Momen）曾表示：「實現發展中國家互相交換技術、資金和資源需要龐大的資金作為媒介，南南合作高級別委員會作為推動這項進程的組織，看到亞投行的創建就是看見了希望。」

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金融支撐，亞投行未來投資方向包括了推動「一帶一路」與各國發展戰略對接，共同發展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推動國際產能合作，提高各國自主發展能力，促進產業鏈、價值鏈深度融合等。這將實質性地推動亞洲各國加速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分享區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收益。顯然，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逐步推進以及亞投行的正式建立，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推動「亞洲命運共同體」建設，將成為亞洲區域合作模式的重要創新。而「中國」最終目標則是建立一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sup>62</sup>。

從全球治理層面上看，亞投行的成立反映出新興經濟體嘗試修正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矛盾，進而在全球經濟治理中謀求更大話語權的利益訴求，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投行便是新興經濟體和亞洲國家對改變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集體回應。作為首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籌建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亞投行75%的股權由亞洲區域內成員，主要是亞洲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持有，無疑將提升這些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促

---

<sup>61</sup> 侯俊榮，習近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研究(2012-2015)，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中華民國105年6月，頁69

<sup>62</sup> 「中國」青年報，亞投行：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新平臺，<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25/c40531-28080975.html>（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進國際經濟合作的權利、機會與規則平等，形成對現有世界經濟金融治理體系和機制的有益補充<sup>63</sup>。



---

<sup>63</sup> 同前註

## 第三章 亞投行簡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是一個向亞洲各國及區域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旨在促進亞洲區域內的聯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並促進發起國「中國」及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亞投行總部設址於「中國」北京，法定資本額為1000億美元，創始成員計有57國，包括37個亞太國家和20個歐、非、美國家，截至2018年10月止，成員國及地區增至87個；2016年1月16日亞投行假北京舉行開業儀式，選出「中國」籍的首屆理事會主席樓繼偉(前「中國」財政部長)及行長金立群(「中國」籍)；目前「中國」、印度和俄羅斯分別以30.34%、8.52%和6.66%的份額成為前三大股東，德國位居第四，韓國和澳洲並列第五。

### 第一節 亞投行的成立與發展

#### 一、成立背景

亞洲計有全球近六成人口，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是當今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但因各國政府建設資金有限，部分國家與地區的鐵路、公路、橋樑、港口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對該區域的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下稱亞銀) 的估計，2010年至2020年間，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總額至少需要8兆美元，其中68%用於新增基礎設施投資，32%用於維護或維修現有基礎設施，等同平均每年需投資8,000億美元，包括新建及修復既有的能源設施4,088億美元、通訊設施1,055億美元，交通設施2,466億美元，以及衛生設施381億美元，其中又以新建能源電廠及交通設施的資金需求最為龐大<sup>64</sup>。目前亞銀總資金約1,600億美元，世銀約2,230億美元，兩家銀行每年能夠提供給亞洲國家與地區的資金僅約200億美元，實無法滿足基建領域如此龐大的資金需求<sup>65</sup>。

<sup>64</su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09), pp. 165-171.

<sup>65</sup> 張君傑，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之政經競合-以結構現實主義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106年7月，頁53

## 二、成立歷程

2013年10月2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假印尼雅加達與該國總統蘇西洛(General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會談時，提出設立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構想，表示願向包括東協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以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及經濟一體化發展；亞投行將與亞洲域內、外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合作、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亞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同月7日，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深化改革開放，共創美好亞太》演說，重申亞投行概念：「亞洲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需求巨大，特別是近來還面臨經濟下行風險增大和金融市場動蕩等嚴峻挑戰，有必要動員更多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為此，『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sup>66</sup>」。2013年10月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第16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時，再度提出籌建亞投行倡議，獲得各國重視，2013年11月亞投行籌設工作正式啟動。

2014年1月24日，「中國」與10多個有興趣的亞洲國家舉行了籌建亞投行第一次多邊工作磋商會議，就籌建亞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換意見，並成立了亞投行籌建工作小組，加快推動籌建工作。此後，中方與有關國家舉行了數次多邊磋商會議，就亞投行的宗旨、治理、總部選址、股權結構等問題進行全面的溝通。同年10月24日，「中國」、孟加拉、汶萊、柬埔寨、印度、哈薩克、科威特、寮國、馬來西亞、蒙古國、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烏茲別克和越南、印尼(印尼政府遲至10月25日方完成備忘錄簽署)等22個創始成員國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預計在2015年內完成章程談判和簽署工作，使亞投行在2015年底投入運作。

## 三、歷次籌建亞投行談判代表會議

2014年11月28日，籌建亞投行談判代表會議首次在「中國」雲南省昆明舉行，22國代表訂定了接納新意向創始成員國的程序和規則，紐西蘭、馬爾地夫、沙烏地阿拉伯、塔吉克等國加入創始成員國行列。

---

<sup>66</sup> 新華社，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全文)，[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3-10/08/content\\_2501676.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3-10/08/content_2501676.htm) (查閱日期：2018年8月15日)

2015年1月15日，籌建亞投行第二次談判代表會議在印度孟買舉行，該次會議審議了亞投行章程草案，決議有意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者應於2015年3月31日前正式提出申請，經現有創始成員國同意，方可參與亞投行籌建會議。同年3月英國、西班牙、荷蘭、義大利等多個歐洲國家紛紛提出申請，成為歐洲已開發國家加入亞投行之先驅。為爭取廣泛國家加入亞投行行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3月28日於亞洲博鰲論壇年會發表主題演講表示：「亞投行是開放的，歡迎沿線國家和亞洲國家積極參與，也張開臂膀歡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舉」，「中國」商務部亦於同日發布「一帶一路」建設的願景與行動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5年3月30日、4月27日籌建亞投行談判代表會議分別假哈薩克及北京舉行，就章程草案進行審議，此時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數量已由最初的21個擴大至57個，遍及全球五大洲，成員屬性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7國集團(G7)、20國集團(G20)、歐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金磚5國及東協10國等<sup>67</sup>。5月22日各國代表假新加坡舉行第五次談判代表會議，會中通過亞投行章程草案，商定6月底假北京舉行章程簽署儀式。

#### 四、正式成立

2015年6月29日創始成員國正式於北京簽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同年12月25日，亞投行首屆理事會主席樓繼偉宣布上述協定正式生效，亞投行宣告成立；2016年1月16日亞投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董事會成立大會假北京舉行。

亞投行籌設大事紀	
2013年10月2日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會談時提出，為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方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習近平並於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多個場合分別介紹了中方倡議。
2013年10月9日	李克強總理出席第16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致辭時提出中方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sup>67</sup> 吳若璋，「中國」倡設「亞投行」的策略、發展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第16卷第3期，頁51

2013年11月	籌建亞投行進程啟動。中方秉承“開放、包容”的原則，按照“先域內、後域外”的步驟以及多雙邊並舉的方式，開始開展廣泛的磋商（其中包括五次多邊磋商會議）。
2014年1月至9月	籌建亞投行共召開五次多邊磋商會。各方就《籌建亞投行備忘錄（草案）》終稿達成共識，並確定了創始成員國關心的一些亞投行核心要素。
2014年10月24日	21個亞投行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備忘錄的簽署標志著各方共同決定成立亞投行，並將加快推進亞投行法律協議的磋商進程。
2014年11月25日	印尼財政部部長班邦代表印尼政府在雅加達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至此，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增至22個。
2014年11月28日	籌建亞投行首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雲南昆明舉行。22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討論了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的議事規則和工作計劃、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的組建方案、工作程序等事項，並為正式啟動《亞投行協定》談判做準備。
2015年1月15～16日	籌建亞投行第二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印度孟買舉行。26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就《亞投行協定（草案）》進行了首次磋商。
2015年3月30～31日	籌建亞投行第三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哈薩克阿拉木圖舉行。29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就《亞投行協定（草案）》修訂稿進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討論。
2015年4月15日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總數達到57個，地域範圍從亞洲擴大至歐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2015年4月27～28日	籌建亞投行第四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就《亞投行協定（草案）》修訂稿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並取得顯著進展。
2015年5月20～22日	籌建亞投行第五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新加坡舉行。參會各方就《亞投行協定》文本達成一致，並商定於6月底在北京舉行《亞投行協定》簽署儀式。
2015年6月29日	《亞投行協定》簽署儀式系列活動在北京舉行。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財長或授權代表出席了簽署儀式，其中已通過國內審批程序的50個國家正式簽署《亞投行協定》。習近平會見出席簽署儀式的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團團長。
2015年7月6日	「中國」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

2015年8月24~25日	籌建亞投行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喬治亞首都提比里斯舉行。會議按照公開、透明、擇優的原則，通過共識選舉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會議還討論通過了亞投行初始階段預算，並再次審議了《亞投行協定》細則及理事會、董事會議事規則等文件。
2015年9月28~29日	籌建亞投行第七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會議審議了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提交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包括亞投行組織架構、人力資源政策、財務政策、業務政策、環境與社會框架、採購政策等。
2015年11月3~4日	籌建亞投行第八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會議審議了亞投行2016年業務規劃及預算、公共信息臨時政策、環境與社會框架、開業準備等一系列文件草案。
2015年11月4日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批准《亞投行協定》的決定。
截至2015年12月25日	包括緬甸、新加坡、汶萊、澳大利亞、「中國」、蒙古、奧地利、英國、新西蘭、盧森堡、韓國、格魯吉亞、荷蘭、德國、巴基斯坦等在內的1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股份總和佔比50.1%）已批准《亞投行協定》並提交批准書，從而達到《亞投行協定》規定的生效條件，亞投行正式成立。
2016年1月16~18日	亞投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董事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

表3-1 亞投行籌設大事紀（摘自人民網「從倡議到正式開業836天，亞投行籌建大事記」，<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16/0115/c1004-28059216.html>）

## 五、亞投行發展現況

亞投行於2016年1月正式開業，截至2018年10月止，成員遍及歐、亞、非、美等五大洲，總數達87個國家與地區，7大工業國除美國、日本外皆是其成員，成員總數已超過亞洲開發銀行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2017年6月亞投行分別獲得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Aaa/Prime-1評級、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AAA/F1+評級及標準普爾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AAA/A-1+評級，且陸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暨美洲投資公司(Inter-Americ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IIC)等多邊開發銀行簽署「融資架構協



定」(co-Financing Framework Agreement)或「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使亞投行營運、融資效能及國際信譽皆堪與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並列<sup>68</sup>。

截至目前，亞投行已在15個國家投資31個基礎設施項目，貸款總額超過64億美元；投資項目遍及東南亞、中東及南亞等區域，貸款內容涵蓋貧民窟改造、天然氣管線建設及電力系統升級等，其中印度獲貸項目高達8個，名列第一，相較下「中國」僅獲貸1個項目，用於建設北京天然氣管線，除符合亞投行對環境友好的貸款原則，亦有宣傳亞投行、提高其國際聲譽的潛在用意。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亞投行第二屆理事年會中表示，未來亞投行將在財務可回收性、對環境友好、社會經濟效益高及受到當地民眾歡迎等前提下持續針對可持續基礎設施、推動私營部門資本參與、跨境互聯互通等三大戰略進行投資項目審核，積極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展開務實合作<sup>69</sup>。亞投行正式運作已邁入第三年，惟在與現有金融機構合作、效益回收及治理團隊成效等方面仍有待觀察。

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

項次	日期	貸款國家	貸款項目	貸款金額 (美元)	聯貸銀行
1	2016.6.24	孟加拉	電力輸配系統升級擴建	1.65億	無
2	2016.6.24	印尼	國家貧民窟改造升級	2.16億	世界銀行
3	2016.6.24	巴基斯坦	M-4 國家高速公路	1億	亞洲開發銀行
4	2016.6.24	塔吉克	邊境道路改善計畫	2,750萬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5	2016.9.27	巴基斯坦	水電站擴建工程	3億	世界銀行
6	2016.9.27	緬甸	建造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發電廠	2,000 萬	亞洲開發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
7	2016.12.8	阿曼王國	鐵路系統、杜庫姆港基礎設施工程	3.1億	無
8	2016.12.21	亞塞拜然	天然氣管線建設項目(TANAP)	6億	世界銀行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9	2017.3.22	印尼	水壩改善與安全工程	1.25 億	世界銀行

<sup>68</sup> 新華網，亞投行獲惠譽最高信用評級，[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7/16/c\\_1121326403.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7/16/c_1121326403.htm)（查閱日期：2017年7月22日）

<sup>69</sup> 「中國」新聞網，亞投行曬兩週年成績單：成員擴至84個項目貸款總額4億美元，<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40950.htm>（查閱日期：2017年7月22日）

10	2017.3.22	印尼	投資區域基礎設施基金	1億	世界銀行
11	2017.3.22	孟加拉	天然氣基礎設施	6,000 萬	亞洲開發銀行
12	2017.5.2	印度	升級安德拉邦 (Andhra Pradesh) 輸配電網項目	1.6 億	世界銀行
13	2017.6.15	喬治亞	巴統市繞城公路	1.14 億	亞洲開發銀行
14	2017.6.15	印度	投資印度基礎設施基金	1.5 億	無
15	2017.6.15	塔吉克	努列克水力發電廠改建工程	6,000 萬	世界銀行 歐亞開發銀行
16	2017.7.4	印度	古吉拉特邦鄉村道路建設	3.29億	無
17	2017.9.4	埃及	太陽能發電站	2.1 億	無
18	2017.9.27	印度	改善電力輸送系統	1 億	亞洲開發銀行
19	2017.9.27	國際金融公司	投資IFC新興亞洲基金	1.5 億	亞洲開發銀行 國際金融公司
20	2017.9.27	菲律賓	改善防洪設施	2.076 億	世界銀行
21	2017.12.8	印度	修建印度班加羅爾的地鐵	3.35億	歐洲投資銀行
22	2017.11.6	阿曼王國	全國光纖寬頻網路	2.39億	無
23	2017.12.8	「中國」	天然氣輸送管網建設	2.5 億	無
24	2018.2.9	孟加拉	配電系統升級改造	6,000 萬	無
25	2018.4.11	印度	印度中央邦 (Madhya Pradesh) 公路建設	1.4 億	世界銀行
26	2018.6.24	印度	投資國家投資及基礎建設基金 (NIIF)	1 億	無
27	2018.6.24	土耳其	擴建土耳其圖茲湖儲氣庫	6 億	世界銀行 伊斯蘭開發銀行
28	2018.6.24	印尼	灌溉系統現代化	2.5 億	世界銀行
29	2018.9.28	印度	安德拉邦 (Andhra Pradesh) 道路建設	4.55 億	無
30	2018.9.28	埃及	修繕下水道設施	3 億	世界銀行
31	2018.9.28	土耳其	能源與基建貸款	2 億	無
合計		貸款項目計31個；總貸款金額超過64億			

表3-2 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自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網站，不包括官網未公布之投資項目）

## 第二節 「中國」籌設亞投行的動機與戰略意涵

亞投行是「中國」由國際規則接受者走向創建者的重要觀察標的，也是習近平大國外交及戰略實踐不可或缺的砥柱基石。「中國」主導成立亞投行具有多重動機及戰略意涵，除展現提供公共財的大國風範與意願外，更隱含對外輸出「中國」主導的國際建制與規則、平衡美國獨大政經勢力、突出南方國家需求與利益，及宣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等戰略構想。亞投行成立3年多來，透過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合作，已在擴大融資部分與國際接軌，更獲得國際信評機構認證，使外界對「中國」首度成立之多邊開發銀行更具信心。以下就「中國」籌設亞投行之動機與戰略意涵進行分項說明。

### 一、亞投行有助「中國」宣傳大國外交

2013年習近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深化改革開放，共創美好亞太》演說提到：「世界經濟仍然處於深度調整期……主要發達經濟體結構性問題遠未解決，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突出。面對世界經濟形勢帶來的新挑戰，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都在努力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亞太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在世界經濟復甦缺乏動力的背景下，亞太經濟體應該拿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推動建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方式<sup>70</sup>」，明確點出已開發國家仍存在經濟結構性問題，及亞洲經濟體應主動承擔經濟發展之責任；又言「亞洲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需求巨大……有必要動員更多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sup>71</sup>」，展現「中國」願向包括東協國家在內的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的意願，可視為「中國」籌設亞投行的背景因素。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以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重大貢獻<sup>72</sup>」。由此可知

<sup>70</sup> 新華網，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08/c\\_12549069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08/c_125490697.htm)（查閱日期：2017年7月22日）

<sup>71</sup> 同前註

<sup>72</sup> 新華網，「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zb/kms/wzsl.htm>（查閱日期：2017年7月22日）

「中國」外交政策已由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晦走向習近平式的有所作為（大有作為），而呈現出外交大戰略的圖像。

「中國」主導成立亞投行，有向外界展現其願承擔國際責任，提供公共財的態度與意願，用以回應外界長期對其「搭便車」的批評，也試圖弱化外界對「中國」崛起恐破壞國際現狀而產生的威脅感。前「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亞投行將為亞洲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讓各國共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果實，化解對『中國』崛起的疑慮，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自「中國」官方發言及文件可看出亞投行承載的外交及戰略目的，對宣傳「中國」外交作為，尤其是習近平主政下「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積極作用。

## 二、亞投行有助「中國」維持經濟動能

「中國」籌建「亞投行」有其經濟資源調配、經濟結構重整之需求。美國挾美元作為國際主要流通貨幣之優勢，常透過寬鬆貨幣政策刺激國內消費及出口，導致追求投資報酬率的大批資本流入利率較高的「中國」，而「中國」為了沖銷湧入的大量熱錢，維持匯率穩定以確保出口產值，僅能大量買進美元或美國國債，導致獲利受到美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美國降息政策的影響，「中國」被迫採行低利率的策略穩定幣值，使得個人所得面臨比通貨膨脹率更低的存款利率，變相地降低了「中國」個人所得和消費能力，使得「中國」國內的消費能力不足，也迫使「中國」銀行向外尋找獲利更高的投資標的，間接鼓勵了「中國」企業對銀行貸款產生超額需求。為替國內龐大資金尋找出路，調配美國國債持有比例，抗衡美國貨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等種種因素，促成了「中國」成立亞投行的壓力來源<sup>73</sup>。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揭示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強調供給及創新結構調整的重要，經濟面將持續深化改革路線，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以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sup>74</sup>。「中國」從世

---

<sup>73</sup> 薛健吾，亞投行正式營運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130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頁46

<sup>74</sup> 新華網，「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nc/zb/kms/wzsl.htm>（查閱日期：2017年7月22日）

界工廠過渡至世界市場顯然需要外在投資及環境配合，借助投資亞洲開發中國家之基礎設施以補充自身國內經濟成長動能，對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維持經濟活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三、亞投行有助「一帶一路」戰略實現

2015年3月28日，「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及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官方文件，其中提到：「透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面向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其中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中國』將透過與周邊國家金融合作，推進亞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並表示『中國』將完善政策措施，統籌國內各種資源以支持『一帶一路』政策，推動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sup>75</sup>」。可見亞投行在提供融資服務方面有助「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踐，且將協助「中國」促進貨幣流通及進行區域金融體制的改革與建設。

### 四、亞投行有助「中國」平衡美國政經勢力

「中國」雖已晉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現由歐美國家主導，以倡導西方價值觀為主的金融機構仍然弱勢，僅能成為既定規則的遵循者，對於國力日強，積極對外投射影響力的「中國」而言，如何更加平衡地反應其國家利益，同時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已成為首要任務。透過亞投行增進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將有利突出「中國」領導地位，平衡美國獨大局面，改善美國與日本透過亞銀長期主導亞洲金融與經濟秩序的現況，並弱化美元的獨佔地位，及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金融霸主的代表性，進一步鞏固「中國」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發言人的地位，創造有利發展中國家治理的金融環境及國際建制<sup>76</sup>。

此外，亞投行促成「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中國」開發內陸地區、平衡區域發展不均問題，並透由經濟走廊與中亞、西亞、歐洲區域國家聯結，擴大經貿腹地及產業鏈一體化，促成歐亞區域經濟整合，形成歐亞大陸合體對抗美洲大陸之經濟區塊，強

---

<sup>75</sup> 新華網，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http://ydyf.people.com.cn/BIG5/n1/2017/0425/c411837-29235511.html>（查閱日期：2017年7月22日）

<sup>76</sup> 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遠景基金會季刊》，18卷2期（2017），頁11

化「中國」居中主導的地位與條件。

## 五、亞投行促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

國際金融機構在援助發展中國家時，往往附帶嚴苛的改革條件，要求受援國依歐美國家標準進行國內政經改革，導致受援國因對西方資本的依賴而喪失內政自主權，或使國家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基此發展中國家展開要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改革的行動，盼將新興經濟體影響力反應在治理框架上，以改善不良的制度設計落實公平正義，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相應的話語權，惟受制於已開發國家投票權優勢而始終未有成效。

其中對改革最積極者非「中國」莫屬，然除投票權差異不易改變外，「中國」發現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已由制度面深化至思想層面，加上國際金融機構管理者多為歐美人士，深受美國價值觀和主流經濟學的影響，難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困境感同身受。且美國對「中國」崛起甚為忌憚，仍持續透過多邊體制企圖打壓「中國」的發展，使「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進度緩慢，但也因此激發了「中國」跳脫既有體制另設亞投行主導規則設計的想法，以便從外部施壓促使國際金融機構重視發展中國家權益，進而調整不利彼等國家發展的外部條件。2016年1月美國國會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第14次配額與管理改革案，將「中國」投票權由3.8%提高至6.09%<sup>77</sup>，美國的投票權則由16.7%略減為16.5%，使「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排名從第六躍升至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並將約6%的股份轉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使巴西、印度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也躋身進IMF股東前十名<sup>78</sup>，美國國會此次迅速通過IMF改革案，除了是對亞投行的具體回應，亦頗有拉攏發展中國家，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一較高下之感。

亞投行的成立體現了發展中國家對改革現有金融體制的期待。近年由於G7成員國大量縮減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加上國際金融機構對於投資週期長且預期收益低的基礎建設態度保守，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脫貧與發展；在此背景下，「中國」成立的亞投行對補充現有金融體制不足與缺陷，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求確有增益。然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對周邊國家投射影響力之舉，亦喚起彼等國家的危機意識。因此「中國」成立

<sup>77</sup> 自由時報電子報，人民幣正式納入IMF特別提款權權重10.92%，<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843209>（查閱日期：2017年5月19日）

<sup>78</sup> 新華網，IMF份額改革正式生效，「中國」投票權升至第三，[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29/c\\_128682430.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29/c_128682430.htm)（查閱日期：2017年5月19日）

亞投行作為多邊投資平臺，除資金需求外，亦強調各國參與及開放治理，以稀釋周邊國家對「中國」主導其基礎設施建設的疑慮，並採取無附加政治條件的援貸方式，開創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中國」運用一個類似霸權穩定的途徑來進行經濟戰略操作，透過亞投行把援助亞洲開發「中國」家的作為加以制度化，藉以營造並鞏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領袖的領導地位，從而確保亞洲區域經濟整合可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來進行<sup>79</sup>。



---

<sup>79</sup> 張君傑，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之政經競合-以結構現實主義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106年7月，頁56

## 第三節 亞投行制度簡介與比較

《亞投行協定》宗旨開宗明義宣示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與區域互聯互通和一體化對亞洲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作為以國家為參與主體的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大體依照國際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作，盼在功能上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形成互補，創建一個更為平等、包容和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sup>80</sup>。根據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國於2015年6月29日簽署之《亞投行協定》，以下將自亞投行職能、成員國資格、股本計算、業務營運等角度切入，就亞投行制度設計進行探討，並與傳統金融機構亞銀之制度進行比較。

### 一、亞投行制度簡介

#### (一) 職能

亞投行職能包括推動區域內發展領域的公共和私營資本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領域；為本區域提供融資服務，以支持整體經濟和諧發展，尤注本區域欠發達成員的需求；鼓勵私營資本參與區域投資，並協助其獲得合理融資，及為強化這些職能開展的其他活動等<sup>81</sup>。

#### (二) 成員資格

亞投行成員資格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和亞洲開發銀行成員開放。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銀行成員同意或代其向銀行提出加入申請<sup>82</sup>。在創始成員國部分，各國除了應該在2015年3月31日前提出意向申請外，根據《亞投行協定》第3條第1項第2款和第58條規定，各個意向創始會員國必須在2015年12月31日前，依照該國內部合法程序同意簽署《亞投行協定》，並於前述期限內將該國的核准文件向《亞投行協定》保存人(「中國」政府)交存，方能正式取得創始會員國資格<sup>83</sup>。

#### (三) 股本

---

<sup>80</sup> 舒建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國際金融秩序」，國際關係研究(北京)，第4期(2015)，頁15-26

<sup>81</sup>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2條規定

<sup>82</sup>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3條規定

<sup>83</sup> 依據《亞投行協定》第57條規定



亞投行的法定股本為1000億美元，區分為100萬股，每股的票面價值10萬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為實繳股本和待繳股本。實繳股本的票面總值為200億美元，待繳股本的票面總值為800億美元。域內外成員出資比例為75:25。經理事會超級多數同意後，亞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調域內成員出資比例，但域內成員出資比例仍不得低於70%，域內外成員認繳股本在75:25範圍內以GDP為依據進行分配。目前總認繳股本為981.514億美元（個別國家未能足額認繳按照其GDP佔比分配的法定股本<sup>84</sup>。其中「中國」認繳額為297.804億美元，占總認繳股本的30.34%，是第一大股東。餘依次為印度、俄羅斯、德國、南韓與澳洲，隨新成員加入，現有成員的股份將遭到稀釋。

#### （四）投票權

亞投行的總投票權由股份投票權（各成員持有的亞投行股份）、基本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12%，由全體成員平均分配），以及創始成員享有的創始成員投票權（600票）組成。基本投票權和創始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比重約為15%。按現有各創始成員的認繳股本計算，「中國」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26.06%。隨著新成員的不斷加入，中方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與投票權比均可能被相應稀釋<sup>85</sup>。

#### （五）業務運營

亞投行的業務分為普通業務和特別業務。其中，普通業務是指由亞投行普通資本(包括法定股本、授權募集的資金、貸款或擔保收回的資金等)提供融資的業務；特別業務是指為服務於自身宗旨，以亞投行所接受的特別基金開展的業務。兩種業務可以同時為同一個項目或規劃的不同部分提供資金支持。亞投行可以向任何成員或其機構、單位或行政部門，或在成員的領土上經營的任何實體或企業，以及參與本區域經濟發展的國際或區域性機構或實體提供融資。在符合亞投行宗旨與職能及成員利益的情況下，經理事會超級多數投票同意，也可向非成員提供援助。亞投行開展業務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貸款、開展聯合融資或參與貸款、進行股權投資、提供擔保、提供特別基金以及技術援助等<sup>86</sup>。

#### （六）業務原則

---

<sup>84</sup>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4、5、6、7、8條規定

<sup>85</sup>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28條規定

<sup>86</sup>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10、11條規定

亞投行業務執行之原則為「不得在成員國反對的情況下，在該成員國境內開展融資業務」、「審議融資申請時，應綜合考慮有關因素，同時適當關注借款方以亞投行認為合理之條件從別處獲得資金的能力」、「提供或擔保融資時，應適當關注借款方及擔保方未來按融資契約規定的條件履行其業務之可能性，並應採取亞投行認為適合該項融資風險的利率、其他費用和還本安排等融資條件」、「不可對融資項目的貨物和服务採購進行國別限制」、「應採取必要措施保證亞投行提供、擔保或參與的融資資金僅用於融資所規定的目標，並應兼顧節約和效率」、「應儘可能避免將過多資金用於單一或某些成員國的利益」、「應設法保持亞投行股權資本投資的多樣化<sup>87</sup>。

### （七）融資條件

亞投行在發放、參與或擔保貸款時，應依照前項之業務原則及《亞投行協定》其他條款的規定，充分考量保障銀行收益和財務狀況需求來訂立契約，以明確該貸款或擔保的條件；當貸款或擔保對象非亞投行成員國時，若亞投行評估後認為可行，可要求該貸款或擔保項目執行所在地的成員國，或者該成員國之某個政府或其他機構，為貸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費用的按期履約償還提供擔保；任何股權及投資金額不得超過亞投行董事會政策文件所允許對該實體或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的比例；另按照「貨幣風險最小化」的政策規定，亞投行可以使用成員國的本國貨幣對亞投行在該國的業務提供融資<sup>88</sup>。

### （八）治理結構

亞投行設立理事會、董事會與管理層等三層架構。理事會由成員國任命理事與副理事各一名，為最高決策機構，具有決定吸收新成員、終止成員資格、增減法定股本、選舉董事、任免行長等權力；董事會共12名董事，包含域內9名與域外3名，負責總體營運，其「非常駐」的運作被視為亞投行的創新；管理層的行長則由域內產生，首任行長為「中國」籍金立群，任期五年可以連選連任，另設立5名副行長<sup>89</sup>，英國籍的亞歷山大爵士任副行長兼公司秘書，負責外聯與會議、德國籍的Joachim von Amsberg任副行長，負責政策與戰略、韓國籍的洪起澤（Kyttack Hong）任副行長兼首席風險官，負責運營風險及財務風險的風控、印度籍的潘笛安（D. J. Pandian）任副行長兼首席投資官，領導銀行投資項目的規劃和監督、印尼

<sup>87</sup>參見《亞投行協定》第13條規定

<sup>88</sup>參見《亞投行協定》第14條規定

<sup>89</sup>參見《亞投行協定》第五章

籍的拉克齊 (Luky Eko Wuryanto) 擔任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負責人力資源、信息技術等部門的規劃、執行和監督<sup>90</sup>。

### (九) 決策機制

亞投行理事會採用簡單多數、特別多數和超級多數原則進行決策。簡單多數指投票權的半數以上；特別多數指理事人數佔理事總人數半數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權不低於成員總投票權一半的多數通過；超級多數指理事人數佔理事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權不低於成員總投票權四分之三的多數通過。除本協定另有明確規定外，理事會討論的所有事項，均應以簡單多數決定。選舉行長、增加資本金、修改協定等重大事項需以超級多數批准，吸收新成員則採用特別多數原則批准<sup>91</sup>。

## 二、亞投行與亞銀的制度比較

亞投行係「中國」主導籌設的第一個全球範圍的多邊開發銀行，鑑於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歐美等傳統大國不同，且對於現行國際規則認同度較低，自創立以來其內部治理、貸款審議、環保標準及營運效能等均遭到各界放大檢視，尤其是美國與日本常將亞投行與既有多邊開發銀行相比，認為亞洲區域已有亞銀提供融資，「中國」成立亞投行係疊床架屋，將破壞國際社會推動之政經改革及環保成效等。對此「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曾表示，亞投行會借鑒、吸收世銀和亞銀一些好的做法，但由於目標不同，治理結構也會有所不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也多次公開表示，亞投行期望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合作，共同參與亞洲基礎設施融資計劃；亞投行與其他國際多邊銀行是合作關係，而非敵對關係，在功能上是互相補充，而非扞格。基此作者將以歷史較悠久、由已開發國家主導的亞洲區域性多邊金融機構亞銀與亞投行進行制度與內涵的比較，試釐清其中的差異及競合關係，以進一步了解「中國」對多邊開發銀行的規劃與對現行制度的改革期許。

### (一) 成立宗旨與目標

根據《建立亞洲開發銀行協定》（以下簡稱《亞銀協定》），亞銀的宗旨是促進亞洲和遠東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合作，並協助本地區的發展中成員國集體和單獨地加速經濟發展的

<sup>90</sup> 中時電子報，亞投行公布5位副行長名單，<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205005538-260408>（查閱日期：2018年5月19日）

<sup>91</sup> 參見《亞投行協定》第28條

進程。為此，「根據本協定規定的條件，亞銀可以向任何成員或其機構、所屬單位或行政部門，或在成員的領土上營業的任何實體或企業，以及參與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國際或區域性機構或企業，提供資金融通」<sup>92</sup>。相較亞銀較為廣泛的經營宗旨，亞投行貸款標的較為明確，主要係針對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進行投資，以促進區域內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及經濟一體化。粗略觀之，亞銀貸款範圍遠大於亞投行，只要對區域經濟增長有益之項目均有機會獲得貸款，然在資源有限之情形下，項目必然產生排擠作用，考量亞洲區域基礎建設資金缺口，亞投行成立確有其必要性及補充功能。

## （二）成員國組成

截至2018年10月，亞投行從創始的57個會員國增加至87個國家與地區，超越亞銀從創始的31個會員國增至目前的67個會員國，而成為僅次於世銀的第二大多邊開發銀行。儘管亞投行成員與亞銀成員多有重疊，然相對於亞銀未接納多數亞洲區域外的發展中國家，使成員重心多集中於太平洋地區；亞投行的成員以歐亞大陸為多，同時包含巴西、南非等兩個域外金磚國家<sup>93</sup>，且持續增員中。亞投行自2015年成立至今，其會員與潛在成員涵蓋世界五大洲，因其範圍之廣也被外界視為具備如同世銀般的全球性開發銀行角色<sup>94</sup>，相較亞銀，亞投行成員地域性特徵較不明顯，且由於成員的普遍性與廣泛性，未來對全球治理與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將在亞銀之上。

## （三）管理機制

亞投行管理模式仿效亞銀，主要以理事會、董事會和以行長為代表的行政團隊進行分層管理。理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由各成員國財長或中央銀行行長組成，每個成員國皆有正、副理事各一名，職權範圍包括批准新成員、增減資本、修訂協定、選舉董事及行長等；董事會是最高日常決策機構，同時負責常態化銀行管理與業務營運，由成員國選出的董事組成，代表成員國行使權力，人數以股份多寡進行分配；行長是銀行的法人代表和管理的行政首腦，在董事會指導下負責處理銀行日常業務。

---

<sup>92</sup> 參見《亞洲開發銀行協議》第19條

<sup>93</sup> Ming Wa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75-77

<sup>94</sup> 濱中慎太郎，亞洲開發銀行、亞洲貨幣基金、東協加三總體經濟研究室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建區域金融制度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3（2016年1月），頁134

亞投行與亞銀在機構設置上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打破了設立常駐董事的慣例，因此亞投行並無實體董事會。這一設置可節省機構運行的成本，具有減少決策摩擦，提高行政管理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等優點，但行政團隊會否因缺乏分層監督而使效能不彰，或理事會缺乏制衡機制衍生之擴權問題亦是外界觀察的重點。此非常駐董事會制度的創新，呼應了2009年世界銀行「現代化治理機制」的高階委員會報告，該報告批評常駐執行董事會核准所有新政策與借貸計畫的安排，雖是管理上的制衡機制，卻也耗費每年700萬美元的大量人事支出，並延遲了計畫的準備進程，使得多邊開發銀行的運作效率不彰，加深了執行董事會與管理層的緊張關係<sup>95</sup>。然而亞投行不常設董事之創舉在實際運行中，也可能面臨新的問題。由於亞投行行長須對董事會負責，而董事代表全體股東即成員國的利益，作為一個多邊機構，隨著亞投行業務的拓展和項目的增多，不設常駐董事恐難以滿足對項目審批的規範和透明要求。因此，在避免發生如同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結構疊床架屋、決策繁復而導致效率低下的同時，能否妥善處理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關係，有效監督管理層的日常工作，對亞投行是一大挑戰<sup>96</sup>。

多邊開發銀行的董事人數一般與成員國數目成正比。亞銀依其成員國總數，包括域內48個和域外19個進行名額分配，計有12個選區，每個選區選出一名董事。前3大股東日本、美國和「中國」是單獨選區，其他9個選區由多個成員國組成。目前，除一個選區董事席位空缺外，12名董事中有4名來自域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sup>97</sup>。亞投行的董事人數（選區數）與亞銀相同，12名董事分別從37個域內成員國和20個域外成員國選舉產生，前2大股東「中國」、印度是單獨選區，其他10個選區由多個成員國組成，12名董事（9名域內3名域外）中有8名來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董事佔比高於亞銀<sup>98</sup>。此外，亞投行將俄羅斯與土耳其歸類為域內成員國，提升了彼等新興市場國家在亞投行中的地位與代表性。

---

<sup>95</sup>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Modernization of World Bank Group Governance, “Zedillo Commission Report: Repowering The World Bank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9), pp. 17-20; David Dollar, Lessons for the AIIB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Bank, (April 27, 2015),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hina-on-the-global-stage/>>.

<sup>96</sup> 鄺梅，謝超，比較視角下的亞投行治理結構，《河北學刊》，第37卷第5期（2017年9月），頁127

<sup>97</sup> ADB, Board of Directors, <https://www.adb.org/about/board-directors> (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sup>98</sup> AIIB Governance,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board-directors/index.html> (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在選舉董事會成員方面，亞銀採取兼顧主權平等和資本實力的「人頭+資本」的選舉方式。亞投行仿效此制度，且為凸顯股東權益及影響力，投票設計上採計資本的比例高於亞銀。在行長人選方面，亞銀及亞投行均明定行長需由域內國家成員擔任，由理事會選舉產生，以凸顯其重要性及代表性；理事會採取「人頭+資本」的方式進行行長選舉，亞銀行長需獲得理事人數一半或以上票數方能當選，亞投行則加重資本的採計比例，以凸顯股東的代表性<sup>99</sup>。

#### （四）投票權設計

投票權設計是多邊開發銀行治理的核心，也是觀察其主導力量及特性的重要指標。

##### 1. 加權投票制

在投票權方面，亞投行仿效亞銀的加權投票制，但投票權計算的方式則有所不同。亞銀投票權分為加權票和基本票：加權票由入股資本決定，是影響成員投票權的主要因素，因為每個國家擁有固定的基本票，因此投入資本的多寡大體上決定了成員國的地位和話語權。亞銀資本分配：域內成員國60%，域外成員國40%；其中日本是亞銀的最大股東，資本佔比15.62%、美國是第二大股東，佔比15.51%、「中國」居次，佔比6.45%，三國的投票權分別為12.80%、12.71%、5.46%<sup>100</sup>，如日、美在亞銀合作，則可享有否決權。亞投行的資本份額以GDP為基礎，依域內成員國佔比75%、域外成員國佔比25%進行攤額，亞投行域內攤額比例高於亞銀，顯示由亞洲區域國家主導的特色。「中國」是域內GDP最高的成員國，也是亞投行的最大股東，擁有32.38%的資本份額和27.85%的投票權<sup>101</sup>，享有一票否決權，其次為印度和俄羅斯，域外國家德國位居第四。資本份額以GDP為基礎和域內成員國攤額比例較高的規定，維護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利益。

從投票權設計來看，「中國」在亞投行的主導作用大於日、美在亞銀的主導作用。即使隨著新成員加入，「中國」的資本份額和投票權都將被稀釋，使其在亞投

---

<sup>99</sup> 鄭梅，謝超，比較視角下的亞投行治理結構，《河北學刊》，第37卷第5期（2017年9月），頁128-130

<sup>100</sup>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ubscription and Voting Power of Member Countries，<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BODINT/Resources/278027-1215524804501/IBRDCountryVotingTable.pdf>。（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sup>101</sup> 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行的地位相對下降，但因「中國」實際GDP約9.21兆美元，域內成員國實際GDP為26.71兆美元，按照亞投行規定的域內外出資比例，即使所有亞洲國家都加入亞投行，「中國」仍然可以佔有較大的資本份額，而域外國家的加入，則不會對「中國」的地位產生實質性影響<sup>102</sup>。

對經濟規模小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基本票的作用大於加權票，由於上述國家GDP較低，能分配的加權票較少，故基本票在總投票權中的比例越高，反而對這些國家有利。可是亞投行的基本票佔比卻低於亞行，且《亞投行協定》明確規定，未能足額繳納資本份額的成員國，其投票權將按比例減少，即實際投票權由實繳比例確定。因此，亞投行中一些因經濟狀況不佳而未能足額繳納資本份額的成員國，其代表性和話語權可能進一步受到影響。

亞投行與亞銀在投票權方面主要的不同之處，是設計了每個創始成員國均享有600票的創始成員國票。創始成員國票不僅僅是能夠吸引更多國家積極加入亞投行，其作用實際上在很大程度相當於基本票，因而對加權票較少的發展中國家影響較大。但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票約佔總投票權的3%，與基本票合計約為15%，仍低於亞銀基本票的佔比。亞投行投票權佔比最高的「中國」，是最低的南亞國家馬爾地夫的95倍；而亞銀投票權佔比最高的日本，是最低的大洋洲國家吐瓦魯的42.63倍。在亞投行投票權佔比小於0.5%的10個域內國家中，有4個國家投票權略高於其在亞銀的投票權，而其餘6個國家的投票權顯著低於其在亞銀的投票權。因此，在投票權分配尤其是考慮發展中國家小國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方面，亞投行仍存在進一步改善的空間<sup>103</sup>。

## 2. 多數表決制

亞投行的投票規則與亞銀相同，採取多數決，同時靈活運用協商一致的非正式表決方式。按照亞投行《協定》，除非有特別規定，如吸收新成員、成立附屬機構、銀行開展協定規定以外的其他融資方式等須經特別多數通過；協定修訂、增加股本、

---

<sup>102</sup> 耿楠，多邊開發金融體系新成員：創新與合作——新開發銀行與亞投行機制研究，《國際經濟合作》，2016(1)，頁91-92

<sup>103</sup> 鄭梅，謝超，比較視角下的亞投行治理結構，河北學刊，第37卷第5期（2017年9月），頁129

下調域內出資比例等重大事項須經理事人數2/3、投票權3/4超級多數通過<sup>104</sup>外，其餘一般事項均由簡單多數通過。此外，亞投行規定使用超級多數表決的標準與亞銀規定一致，且兩者特別多數和超級多數的採計方法均是以「人頭+資本」的方式計算。在實際運作中，亞銀會採取協商一致的非正式表決方式，即透過各成員國間取得共識、相互妥協和諒解達成決議，此方式尤其適用於重大事項的表決，如行長人選通常經董事會/理事會協商一致而產生。亞投行也推崇重要事項以協商一致的方式決議，企圖弱化「中國」在其中的主導色彩，以降低外界對亞投行獨立性的疑慮，故「中國」雖是亞投行最大股東，擁有實質的一票否決權，但在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sup>105</sup>下，「中國」對否決權態度保守，重要事項仍傾向透過協商一致的方式達成決議。

#### (五) 貸款條件

多邊開發銀行以政治條件作為貸款前提的作法長期引起發展中國家反彈，認為是對國家主權的侵犯，經統計，亞銀政策性貸款的附加條件多，在2000年~2010年間，亞銀政策性貸款的平均附加條件為31項<sup>106</sup>；世行也常在貸款項目中附加各種旨在影響發展中國家國內制度的貸款條件，而常被詬病與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和實際需要脫節，導致彼等國家不堪重負。非營利組織「歐洲債務與發展網絡」(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Eurodad) 2006年的報告顯示，貧困國家仍面臨來自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苛且不斷增加的貸款條件，平均每筆世行貸款會附加67項條件，有些國家面臨的數量甚至遠超於此，報告指出有3個國家貸款條件超過100項，其中附加條件最多的是烏干達，共計197項，其中社會和環境領域條件87項，公共部門改革條件72項，金融和經濟改革條件35項<sup>107</sup>。反觀亞投行，雖通過《環境與社會框架》將環境和社會風險作為每個貸款項目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堅持不附

---

<sup>104</sup>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506/P020150629360882378045.pdf> (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sup>105</sup> 人民網，亞投行：國際經濟金融合作發展「推進器」，<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05/c40531-28012498.html> (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sup>106</sup> 廖凡，比較視野下的亞投行貸款條件研究，《法學雜誌》，2016年第6期，第26頁

<sup>107</sup> Eurodad Report, "World Bank and IMF Conditionality: A Development Injustice", <http://www.eurodad.org/files/pdf/454-world-bank-and-imf-conditionality-a-development-injustice.pdf>. (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加政治條件，迄今也未向貸款國家提出如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銀等常用之貸款條件（如公共部門改革、金融和經濟改革等）。

亞投行作為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多邊開發機構，在籌備過程中即表明亞投行的貸款政策將充分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經驗和教訓，在堅持不附加政治條件的同時，遵循項目評估、對環境的影響、保護當地文化、促進健康持續的經濟發展等標準，同時確保貸款標準與受援國國內實際情況間的平衡<sup>108</sup>。不設置政治性條件是《亞投行協定》確立的「去政治化」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機構最大不同之處。



---

<sup>108</sup> 新華網，亞投行貸款不附加政治條件，[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5-05/27/c\\_1115429911.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5-05/27/c_1115429911.htm) (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 第四節 小結

「中國」創設亞投行有其內政與外交動機，在內政部份，亞投行有助「中國」向外輸出過剩的產能及基礎建設技術，紓解國內經濟調控、失業，以及原料滯銷等壓力；在外交部分，亞投行補充既有國際經濟制度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缺口，及改善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貸款環境；對於美國長期壟斷的經濟獨大地位，更有平衡效果。在亞投行催化下，將有助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降低「中國」鉅額美元外匯儲備的風險和負擔。亞投行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具輔助作用，「中國」藉由強化與沿線發展中國家之經文交流，提升其政經影響力及大國聲望，達到宣傳「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目的，以進一步實現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sup>109</sup>。

亞投行的成立象徵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逐漸由制度的遵循者走向制度的創建者的過程，代表的不只是發展中國家實力的提升，更是對既有現狀不滿的具體回應。鑑於既有國際金融組織及建制無法有效且立即的反應發展中國家需求，亞投行標榜為彼等國家服務，在職能定位及內部治理方面落實發展中國家主導模式，向世界輻射新興國家群體之政經影響力，要求相應的話語權及治權，以便逐步改變由已開發國家利益為導向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積極地扭轉南北失衡現狀。

然而亞投行對國際金融現狀的挑戰必然引起以美國為首的既得利益者的不安，「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隨著「中國」推進亞投行創設進程，美國的抵制也漸趨激烈，惟在拉攏已開發之歐陸國家共組統一陣線，企圖削弱亞投行成立的基礎及正當性遭遇挫折後，美國也不得不正視並積極因應亞投行對既有政經秩序可能帶來的改變。歐陸國家參與「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投行，代表了「中國」實力增長與美歐國家整體實力消退的金融新情勢，未來勢對目前多邊治理架構及金融秩序產生深遠的影響。亞投行自2015年底正式成立，迄今（截至2018年10月）已達87個成員與地區，涵蓋世界五大洲，其參與國代表性已勘與美日主導的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相抗衡，逐漸衝擊了長期由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此部分將在後續章節進行討論。

基本上，亞投行被視為有助減少亞洲貧窮的「中國」方案。在亞投行快速的成立過程中，各國積極申請加入成為創始會員國的考量因素，除著眼「一帶一路」沿線基礎建設的潛

---

<sup>109</sup> 黃美鳳，「中國」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118期(2015/02/01)，頁4

在商機與較為寬鬆的放貸條件外，也是為了要取得亞投行創始會員國的特殊決策權，期能擁有一些未來可用以制衡和影響北京的籌碼。亞投行的成立代表「中國」試圖將金融制度建立融入其戰略佈局中，即使面對美國強力反彈，亞投行仍順利營運也顯示：「中國」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提升，及外界對「中國」尋求國際治理地位的認同。亞投行承載「中國」改變、創建國際政經秩序，及發揮大國影響力的深切期望，更是「中國」能否贏得國際認可為負責任的大國、轉型為公共財提供者、國際規則制定者的重要轉捩點；面對「中國」挑戰之金融現狀，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如何延續霸權穩定現狀，世界銀行及亞銀等現有國際金融組織如何在制度面與亞投行進行整合，將是未來觀察研究之重點。



## 第四章 亞投行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的創新模式，體現了「中國」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理念，而亞投行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支撐，透過對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貸款，有助「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及歐亞經濟一體化實現。目前亞投行成員國已達87個國家與地區（截至2018年10月），且與「一帶一路」參與國重疊性高，隨著「一帶一路」戰略推展，亞投行核准之貸款項目與國家將與之高度配合，在帶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撬動當地國私人資金等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下，助力「中國」推動亞洲區域政經秩序重建的戰略目標。

### 第一節 亞投行貸款特性分析

亞投行作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融資平臺，在貸款國家、項目及金額上均反映「中國」的戰略利益與政策偏好。迄今（截至2018年10月）亞投行已核准31個貸款項目，就貸款總額及區域分析，以南亞國家總計24.54億美元，及西亞國家總計15.14億美元為大宗，南亞計有印度、孟加拉及巴基斯坦等3國，西亞計有亞塞拜然、喬治亞、土耳其等3國，其中又以印度及土耳其獲得貸款金額最高，分別為17.69億美元及8億美元；東南亞地區以印尼獲得貸款金額最高，計有6.91億美元；非洲則僅有埃及一國獲得貸款，計5.1億美元。分析個別國家獲貸款金額高低分別為印度、土耳其、印尼、亞塞拜然及阿曼。對照「一帶一路」橫跨亞、歐、非等範圍可知，亞投行提供貸款之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度重疊，如塔吉克、土耳其等國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連接亞洲與歐洲的重要門戶；印尼、印度是「海上絲綢之路」在印度洋的重要停泊基地；阿曼、埃及則緊扼波斯灣及紅海咽喉，更遑論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對「中國」興建「中巴經濟走廊」及「中孟印緬經濟走廊」的重要性。

根據「一帶一路」官方公布之涵蓋地區，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包括三條路線：1. 「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2. 「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3. 「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方向則是：1. 從「中國」沿海港口經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2. 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中國」在長年外交佈局下，雖已與周邊多數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多為點狀或塊狀，「一帶一路」戰略目的即是要連結這些點塊狀為一個互聯互通的整體。另自亞投行貸款項目觀之，明顯偏重能源及運輸領域，契合「中國」國務院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內容，該官方文件中強調設施聯通的重要，包括道路、港口、油氣、電力及光纖管道的聯通均為「一帶一路」建設推動的優先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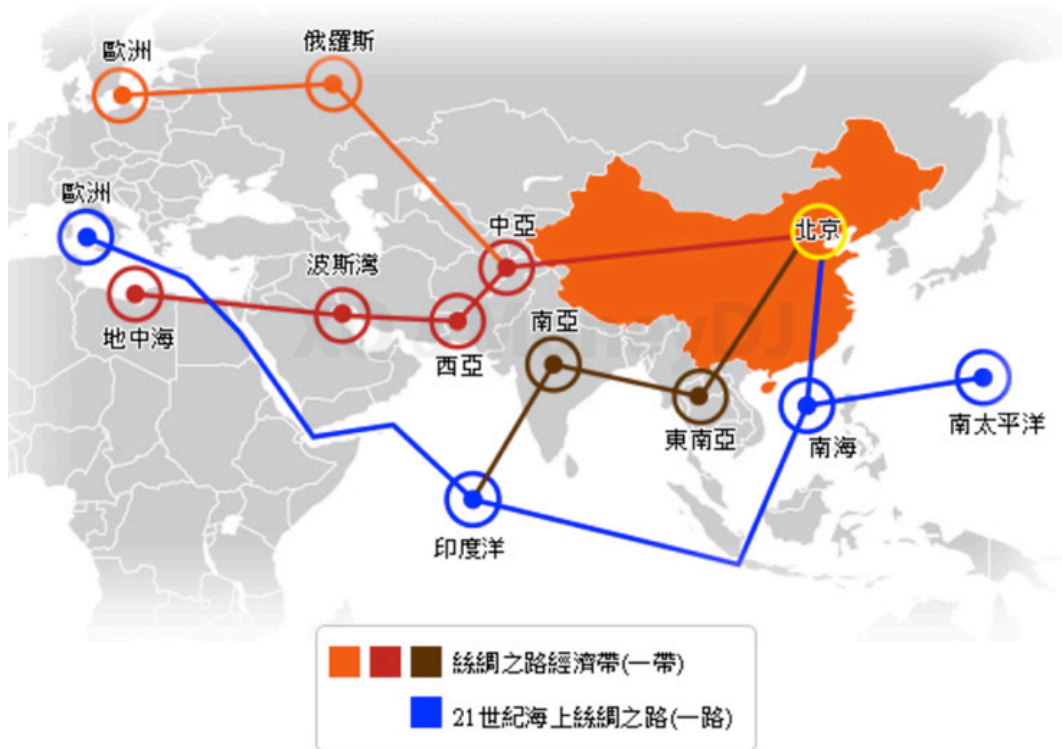


圖4-1 「一帶一路」示意圖 (摘自網路<http://newjust.masterlink.com.tw/HotProduct/HTML/Basic.xdjhtm?A=PB301-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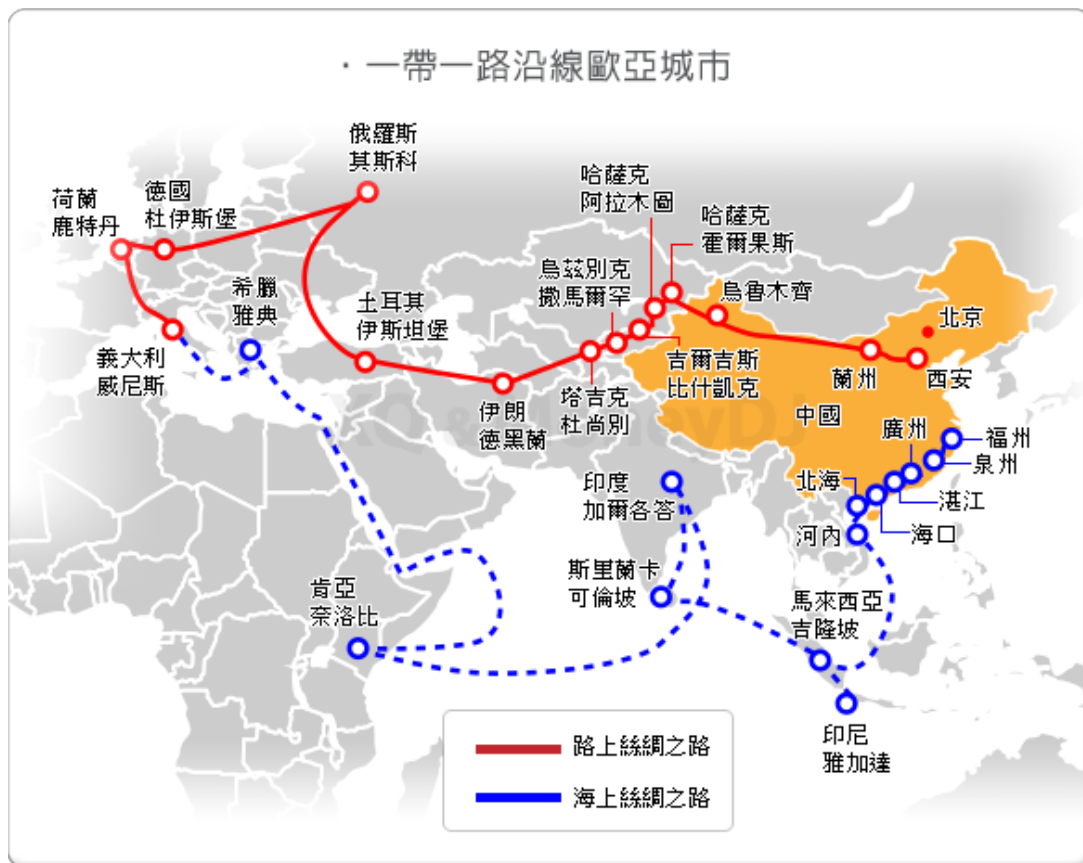


圖4-2 「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示意圖 (摘自網路[HTTP://NEWJUST.MASTERLINK.COM.TW/HOTPRODUCT/HTML/BASIC.XDJHTM?A=PB301-1.HTM](http://NEWJUST.MASTERLINK.COM.TW/HOTPRODUCT/HTML/BASIC.XDJHTM?A=PB301-1.HTM))

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 (依區域)						
區域	國家	國家屬性	項目數	項目內容 (億美元)	項目類別	總金額 (億美元)
東南亞	印尼	域內創始	4	1. 國家貧民窟改造升級 (2.16) 2. 水壩改善與安全工程 (1.25) 3. 投資區域基礎設施基金 (1) 4. 灌溉系統現代化 (2.5)	城市發展、水利、中介基金	6.91
	緬甸	域內創始	1	建造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發電廠	能源	0.2
	菲律賓	域內創始	1	改善防洪設施	水利	2.076
總金額				9.186		

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依區域）

區域	國家	國家屬性	項目數	項目內容（億美元）	項目類別	總金額（億美元）
南亞	印度	域內創始	8	1.升級安德拉邦輸配電網項目(1.6) 2.投資印度基礎設施基金(1.5) 3.古吉拉特邦鄉村道路建設(3.29) 4.改善電力輸送系統(1) 5.修建印度班加羅爾的地鐵(3.35) 6. 修建印度中央邦公路(1.4) 7.投資國家投資及基礎建設基金（NIIF）(1) 8.建設安德拉邦道路(4.55)	能源、運輸、中介基金	17.69
	孟加拉	域內創始	3	1.電力輸配系統升級擴建(1.65) 2.天然氣基礎設施(0.6) 3.配電系統升級改造(0.6)	能源	2.85
	巴基斯坦	域內創始	2	1.M-4 國家高速公路(1) 2.水電站擴建工程(3)	能源、運輸	4
總金額	24.54					
中亞	塔吉克	域內創始	2	1. 邊境道路改善計畫(0.275) 2.努列克水力發電廠改建工程(0.6)	能源、運輸	0.875
總金額	0.875					
西亞	亞塞拜然	域內創始	1	天然氣管線建設項目	能源	6
	喬治亞	域內創始	1	巴統市繞城公路	運輸	1.14
	土耳其	域內創始	2	1.擴建土耳其圖茲湖儲氣庫(6) 2.投資能源與基建貸款(2)	能源、中介基金	8
總金額	15.14					
中東	阿曼王國	域內創始	2	1.鐵路系統、杜庫姆港基礎設施工程(3.1) 2.全國光纖寬頻網路(2.39)	運輸、電信	5.49
總金額	5.49					
非洲	埃及	域外創始	2	1.太陽能發電站(2.1) 2.修繕下水道設施(3)	能源、水利	5.1
總金額	5.1					

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依區域）						
區域	國家	國家屬性	項目數	項目內容（億美元）	項目類別	總金額（億美元）
東亞	「中國」	域內創始	1	天然氣輸送管網建設	能源	2.5
總金額	2.5					
國際組織	國際金融公司		1	投資IFC新興亞洲基金	中介基金	1.5
總金額	1.5					

表4-1 亞投行貸款項目彙整表（作者參考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官網自行摘整，不包括官網未公布之投資項目）

茲歸納亞投行截至2018年10月之貸款項目（請參上表）特點如次：

一、從投資地域來看，以域內國家投資為主(域外僅有1個)。亞投行目前計貸款31個項目，涵蓋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西亞及非洲等13個成員國。投資具體情形為：印尼4個項目6.91億美元、緬甸1個項目2,000萬美元、菲律賓1個項目2.076億美元；印度8個項目17.69億美元、孟加拉3個項目2.85億美元、巴基斯坦2個項目4億美元；塔吉克2個項目8,750萬美元；亞塞拜然1個項目6億美元、喬治亞1個項目1.14億美元、土耳其2個項目8億美元；阿曼2個項目5.49億美元；「中國」1個項目2.5億美元；埃及2個項目5.1億美元；國際金融公司（IFC）新興亞洲基金1.5億美元。

經統計可知，亞投行的業務重點在亞洲，卻不限於域內成員。根據《亞投行協定》對其目的和功能的表述，凡是利於亞洲區域發展的項目，包括域外項目，都是亞投行投資的範圍。可預期未來在符合「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原則下的國家，不論域內或域外，隨著亞投行業務開展，將會與「中國」有更密集的技术及資金往來，對人民幣流通扮演重要的助力角色。

二、從投資領域看，以能源、交通和水利為主。尤其能源與交通運輸為亞投行投資的重點項目，具體投資情形為12個能源項目投資額達25.85億美元，8個交通項目投資額達18.105億美元，2個城市發展項目投資額達4.66億美元，3個水利項目投資額達6.326億美元，1個電信項目2.39億美元，5個金融中介項目投資額達7億美元(投資項目由金融中介自行決定)。



分析亞投行投資的所有項目可知，能源相關項目佔亞投行當前投資的最大比例，交通運輸居次，大體符合亞投行促進亞洲區域互聯互通建設的宗旨。亞投行副行長安周奇(Joachim von Amsberg)於2018年5月接受專訪時提到：「亞投行未來的項目投資將側重三大方面：首先項目將聚焦清潔能源、可持續性城市、城市公路等；其次是實現跨國及跨區域聯通，包括中亞和東協等地區；第三大重點是吸引私營部門融資」<sup>110</sup>。在清潔能源部分，「中國」的天然氣輸送管網與印度的電力輸送系統最具代表性，前項預計每年可為北京減少65萬噸標準煤的使用，減排二氧化碳59.57萬噸、顆粒物3700噸、二氧化硫1488噸、氮氧化物4442噸<sup>111</sup>，有效改善北京地區冬季霧霾和空氣品質；後者則是對印度政府推動的「綠色能源走廊」倡議進行實質的支持。《亞投行能源投資戰略》要求能源投資必須符合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原則，就目前亞投行本身核准且執行之貸款項目看來，確朝著清潔能源的道路邁進。

三、從投資對象看，以主權擔保貸款為主。亞投行自營運以來一再強調債務的可持續性與確保投資方收益等永續發展目標，自目前投資項目看來，亞投行投資項目以主權擔保貸款為主，26個項目中（排除5個多領域金融中介項目）有20個項目由主權進行擔保。其中主權擔保貸款分為兩類：一是主權國家政府直接作為借款方；二是私營主體作為借款方，政府作為擔保方，由於有政府信用作為擔保，主權擔保貸款可最大限度確保貸款和利息回收，是最安全的貸款，有助亞投行在國際評級機構中獲得較高之信用評級，2017年亞投行獲得了三大評級機構3A的最高信用評級。在吸引私營部門融貸部分，亞投行投資的私營主體包括北京燃氣集團、阿曼全球物流集團、阿曼寬帶公司、埃及AlSubh太陽能公司、緬甸Sembcorp公司等，根據《亞投行協定》第11條，亞投行有權投資私營部門，但該私營部門作為借款方若無政府進行擔保，則將提高亞投行的貸款風險<sup>112</sup>。

---

<sup>110</sup> 新華社，亞投行兩年半投資26個項目，未來聚焦三大重點，<http://silkroad.news.cn/2018/0529/97968.s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5日）

<sup>111</sup> 新浪網，亞投行首個對華項目落戶北京助力清潔能源發展，<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7-12-12/doc-ifypnyqi3879626.s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5日）

<sup>112</sup> 新華社，亞投行投資項目的六大特點，<http://silkroad.news.cn/2018/0118/80213.s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5日）

四、從投資方法看，以聯合融資為主。《亞投行採購政策》第5.11段把聯合融資分為兩類：平行聯合融資（parallelco-financing）和共同聯合融資（jointco-financing），上述二者均發生在同一項目下，區別在於：前者投資各方為此項目下的不同部分分別提供融資；後者投資各方為此項目下的同一合同共同提供融資<sup>113</sup>。在亞投行31個項目中，有9個和世界銀行聯合融資，4個和亞銀聯合融資，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聯合融資項目各1個，超過兩個以上銀行（多邊開發機構）聯合融資項目5個，其餘項目獨自投資。

這些聯合融資項目審查主要由聯合融資方主導，因此環境與社會標準、採購標準等也以適用對方標準為主。但是亞投行並不缺少獨立融資項目，孟加拉國的配電系統升級項目、印度的古吉拉特邦鄉村道路項目、北京的天然氣輸送管網項目，及阿曼的2個項目等均為亞投行獨立融資。獨立融資項目由亞投行主導，因此適用亞投行的環境與社會標準、採購標準和程序<sup>114</sup>。

五、亞投行投資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ry, FI）項目。此類基金吸取包括亞投行資本在內的各類資金，轉而投資交通、能源或其他項目。目前亞投行共投資5個金融中介類項目，分別是印度基礎設施基金、印尼區域基礎設施發展基金、IFC新興亞洲基金、印度國家投資及基礎建設基金（NIIF）及土耳其能源與基建貸款等。其中，印度基礎設施基金是亞投行以股權形式投資的第一個項目，投資對象是投資組合公司（portfoliocompanies），投資領域很廣泛，涵蓋醫療保健和教育。印尼區域基礎設施發展基金由世界銀行領銜，亞投行參與提供貸款，借款方是印尼地方政府。IFC新興亞洲基金是IFC管理的私募股權基金，入股金融機構、產業公司以及其他私營主體，但不尋求控股。印度國家投資及基礎建設基金（NIIF）由印度政府發起，目的是吸引更多私人資本投資印度基礎設施，並作為國際和本土投資者投資印度基建的合作平臺<sup>115</sup>。一般金融中介基金具有自主決定資金用途的權利，但需要符合亞投行的特定要求，例如在IFC新興亞洲基金中，亞投行資本不得用於投資非亞投行

---

<sup>113</sup> 同前註

<sup>114</sup> 同前註

<sup>115</sup> 第一財經，亞洲基建每年缺口1.4萬億美元 亞投行歡迎各類社會資本參與，<https://www.yicai.com/news/5434661.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5日）

成員等，但因亞投行對此類中介基金決定不具強制性，故引發環保團體對亞投行資金被轉投資非綠色項目之疑慮。



## 第二節 亞投行助力「一帶一路」交通建設

設施聯通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五通之一，旨在加強沿線國家間的交通、能源輸送及電訊設施等基建聯通。當中又以交通運輸最為關鍵，涉及鐵路、公路、港口等大型基建，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屬於優先考慮和發展的項目，「要致富先修路」是「一帶一路」的核心概念，「中國」推動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規劃，透過資金及技術標準的對接，形成緊密連接亞洲各區域及亞歐非之間的運輸、物流網路，可有效提升「中國」與歐亞大陸區域國家的貿易便捷程度。同時，亞投行於2018年10月9日假北京發佈〈交通項目投資策略〉，表示亞投行今後將優先為能夠促進交通一體化的跨境互聯互通項目，以及現有交通基礎設施的升級改造等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旨在以此促進亞洲貿易與經濟發展。簡而言之，連接主要城市或重要經濟區的國際、省際高速公路或鐵路，以及機場、港口、聯運樞紐、物流園區等能夠促進資源高效流通的項目將獲重點支持<sup>116</sup>。

自亞投行迄今核准之交通項目可知，多集中於南亞區域，該區印度與巴基斯坦共計有5個項目，貸款金額達13.59億美元，佔所有交通項目總額的近8成。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紹爾果德至哈內瓦爾段)項目為亞投行首批核准的項目之一，同期(2016年6月24日)獲核准項目尚有孟加拉的電力輸配系統升級計畫、印尼的國家貧民窟改造升級計畫與塔吉克的邊境道路改善計畫。自亞投行首批貸款項目性質分析，計有兩個交通項目、一個能源項目及一個城市發展項目，四個項目分別隸屬不同領域，作為亞投行首批核准的貸款項目，極具象徵意涵，除展現亞投行投資的多元性，卻也突出「中國」的外交偏好與戰略考量。

巴基斯坦與「中國」素來外交關係緊密，「中巴經濟走廊」又是「一帶一路」連接「中國」新疆喀什至瓜達爾港的重要戰略要道，而M4高速公路是「中巴經濟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改善巴基斯坦南北往來交通，及加速以此為主幹的「中巴經濟走廊」交通網絡形成。M4高速公路位於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人口第一的大省，目前對巴國GDP的貢獻率達6成以上，年經濟增率在6%~8%之間，且旁遮普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巴基斯坦製造業最

<sup>116</sup>人民網，亞投行發布交通項目投資策略，<http://industry.people.com.cn/BIG5/n1/2018/1009/c413883-30331101.html> (查閱日期：2018年12月5日)

發達的省份。亞投行選擇此項目作為開業首批核准項目，承擔風險相對偏低，有利提升外界對亞投行專業及營收可持續性的信心<sup>117</sup>。

M4高速公路（紹爾果德至哈內瓦爾段）全長64公里，為雙向四車道設計，由「中國」葛洲壩集團、北新路橋公司承建，計劃於兩年內完工。此段工程重要之處在於，它是目前巴方批准、「中」方承建的「中巴經濟走廊」主幹高速公路項目的最後一個路段。此前，2015年11月16日，由中鐵一局等承建的M4二期（苟吉拉到紹爾果德段）；2016年4月28日，「中巴經濟走廊」的另一重點公路項目—喀喇崑崙公路升級改造二期（哈維連至塔科特段）；2016年5月6日，延續M4向南通向卡拉奇（M5）的高速公路項目（蘇庫爾至木爾坦段）皆已陸續動工。2016年8月13日亞投行承貸的M4工程（紹爾果德至哈內瓦爾段）項目正式開工，標誌著從「中國」從新疆喀什經喀喇崑崙公路（一期、二期）到伊斯蘭堡、拉合爾，然後經M4到木爾坦，再經M9到卡拉奇，貫穿巴基斯坦全境的縱向主幹道逐漸成形<sup>118</sup>。



圖4-3 巴基斯坦高速公路示意圖（摘自網路<https://news.cnyes.com/news/id/2155784>）

<sup>117</sup> 財經，亞投行「化敵為友」合作拿下首單，背後有何考量，<https://kknews.cc/finance/xvrgq.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6日）

<sup>118</sup> 「中國」經濟網，中巴經濟走廊交通網加速形成，<https://kknews.cc/world/pr6rpe.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6日）

塔吉克為上合組織一員，經濟雖相對於其他中亞國家落後，但地理位置重要，東鄰「中國」、東南接巴基斯坦、北方與吉爾吉斯接壤，西方則緊靠烏茲別克，是「中國」通往歐洲大陸的必經之地。鑒於塔吉克為高山之國，極度仰賴公路運輸，「中國」諸多公路建設公司自2006年起便積極經營塔吉克道路基建市場，尤其是「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國」路橋）」。該公司在塔吉克已累計修建公路600多公里和隧道16公里，2016年塔吉克自亞投行貸款項目「杜尚別—烏茲別克邊境道路」便是由「中國」路橋承攬，據「中國」媒體報導，自塔吉克獨立以來，有近七成的公路，都由「中國」路橋修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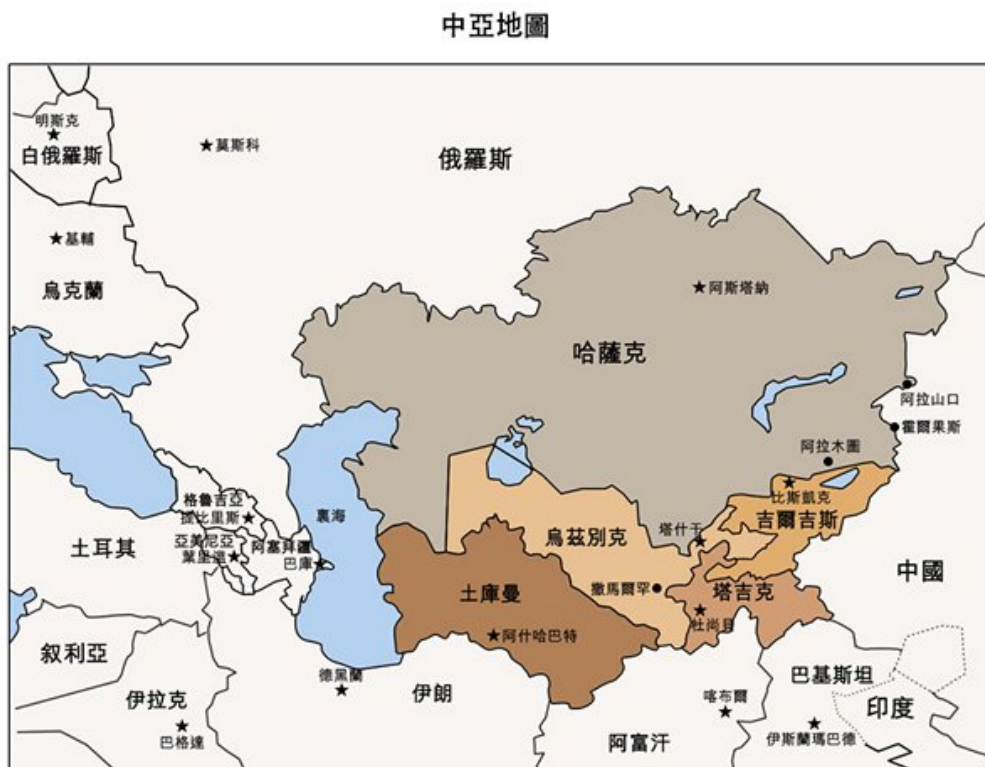


圖4-4 中亞各國位置圖（摘自網路 [HTTPS://HKMB.HKTDC.COM/TC/1X0A4C4W/](https://hkmb.hktdc.com/tc/1X0A4C4W/)）

2013年9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假哈薩克首次提出「一帶一路」戰略，顯示中亞在此戰略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屬於橫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六大經濟走廊之一，從「中國」新疆的阿拉山口與中亞及西亞的鐵路網絡連接，直達波斯灣、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島，範圍遍及中亞五國，及西亞的伊朗和土耳其<sup>119</sup>。2014年，習近平曾到訪塔吉克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包括在當地投資公路、鐵路，及土庫曼至「中

<sup>119</sup> HKTDC，經貿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個中亞市場概覽，<https://hkmb.hktdc.com/tc/1X0A4C4W/>（查閱日期：2018年12月6日）

國」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塔吉克段工程，被視為是「一帶一路」的先驅。2017年，塔吉克總統訪華，兩國簽署合作計劃，承諾將塔吉克的「2030年塔吉克國家發展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對接，在電力、農業、交通基建、金融、旅遊等多個範疇加強合作。「中國」在上合組織內拉攏塔吉克以穩定西部邊界，又透過「一帶一路」連接塔「中」兩國交通及能源，可預期未來「中國」在中亞地位將更為穩固，遑論在亞投行角色下，「中」資企業對中亞國家的領先優勢也是其他外資難以匹敵的<sup>120</sup>。

在亞投行核准的交通項目中，除了對「一帶一路」有明顯支持作用的巴基斯坦及塔吉克項目，另外就以印度佔比最高，總計有4個，分別為古吉拉特邦鄉村道路建設、班加羅爾地鐵修建、中央邦公路修建及安德拉邦道路建設工程等。然相較於其他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交通互聯互通的支持，印度基於國安考量態度保守甚至傾向反彈，加上與「中國」長期邊界領土紛爭，對「中」巴友好的忌憚及採取美、「中」戰略平衡等因素，與「中國」外交關係始終若即若離，但基於國內對基礎建設的龐大需求，印度仍積極參與亞投行並居中尋求領導地位。自「中國」輸出本身過剩產能及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立場出發，印度獲得亞投行超過1/4的貸款除了反應印度第二大出資國的影響力外，不無「中國」刻意拉攏之意。

「一帶一路」向印度洋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CIM）」自2013年5月「中國」與印度政府達成共識後啟動。BCIM是從「中國」昆明，經過緬甸、印度東北部地區、孟加拉，一直聯通到印度加爾各答的道路交通基礎建設與經濟貿易合作倡議。「中國」西南地區、印度東北部、緬甸與孟加拉等地經濟發展相對落後，透過建設國家層級的經濟走廊，有利各方優勢互補，形成合理的國際分工，帶動產業結構調整，進而促進南亞、東南亞與東亞三大經濟板塊聯合發展<sup>121</sup>。2014年12月，BCIM聯合工作組第二次會議假孟加拉科克斯巴扎爾召開，四國探討了在互聯互通、能源、投融資、貿易便利化、可持續發展與扶貧及人力資源、人文交流等重點領域合作、建構機制的想法，並承諾加快推進BCIM建設。惟2017年「中」印發生洞朗對峙事件後，BCIM計畫陷入了停滯，直至2018年4月26日，「中國」領導人與印度總理莫迪在武漢舉行非正式會晤，就「中」印關係未來發展交換意見，雙方同意在BCIM

---

<sup>120</sup>沈旭暉專欄，一帶一路之塔吉克：中亞最慢起步，<http://www.ir-basilica.com/>（查閱日期：2018年12月6日）

<sup>121</sup>環球，關於孟中印緬印度走廊，印度在猶豫什麼？<https://kknews.cc/zh-tw/world/46lgrxv.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6日）

框架下加快經濟合作。6月9日，兩國領導人在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期間再次舉行雙邊會晤，確認了加強包括BCIM在內的地區互聯互通合作。

亞投行在印度的交通項目除了有助安撫印度對「一帶一路」「中巴經濟走廊」的不滿，更有助「中國」企業進入印度市場，特別是勞力密集型產業，早已因「中國」工資高漲而紛紛遷往南亞、東南亞區域，加上南亞市場龐大，未來「中」印間的貿易和投資潛力難以估計，所以亞投行項目輔助印度區域交通建設，待日後與BCIM進行聯結，對於「中國」企業進入印度全境、「中國」勢力前進印度洋海域，都是一石多鳥之策。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路線圖



圖4-5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路線圖 (摘自網路[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研究文章/孟加拉作為生產基地-近期發展及港商機遇/RP/TC/1/1X000000/1X0A836L.HTM](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研究文章/孟加拉作為生產基地-近期發展及港商機遇/RP/TC/1/1X000000/1X0A836L.HTM))



### 第三節 亞投行助力「一帶一路」能源建設

自亞投行投資區域及項目表可知（表三），亞投行迄今共投資12個能源項目，金額高達25.85億美元，佔投資總額的4成；自區域分析，貸款國多集中於西亞地區，又以亞塞拜然的天然氣管線建設及土耳其的圖茲湖儲氣庫擴建工程最具代表性，分別獲得高達6億美元的貸款，遠高於亞投行其他項目個別貸款金額，足見亞投行對能源基建的重視與支持；自能源項目內容分析，涵蓋了水電、太陽能、燃氣發電、油氣管網和電網建設等再生能源及能源基建優化計畫。亞投行2017年5月批准印度第一筆1.6億美元的貸款，用於幫助印度安得拉邦的不間斷供電計畫，以提升該區域的電力傳輸和配電系統可靠性，協助該邦實現「全民供電」計畫，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當時記者發布會上表示：「亞投行支持其成員向低碳能源結構轉型，推動能源效率的提高，比如升級現有的傳輸和配送網絡<sup>122</sup>」。

在「一帶一路」戰略中，「中國」尤其重視能源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在確保輸油、輸氣管道等運輸通道安全的前提下，將進一步推動跨境電力與輸電網建設，促進區域電網升級與改造。2015年9月26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提出「探討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的倡議，為世界能源轉型和互聯互通提出了「中國」方案，得到國際社會的熱烈響應。全球能源互聯網是以特高壓電網為骨幹網架、全球互聯的智能電網，是清潔能源在全球範圍大規模開發、輸送與使用的基礎平臺，也是「智能電網+特高壓電網+清潔能源」概念的整合<sup>123</sup>。

2016年3月「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發起成立「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簡稱合作組織）」，作為推動全球能源互聯網建設的主要單位。根據該組織協議，合作組織將與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在能源政策、經濟、技術、研究及援助項目等領域展開合作，與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聯合制定亞洲及環太平洋地區電力互聯互通路線圖；與「非洲聯盟委員會」推動非洲電網互聯、實現非洲和世界能源可持續發展；與「阿拉伯國家聯盟」推進阿拉伯國家間跨國電力貿易領域及相應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與「海灣國家合

---

<sup>122</sup> 新華網，亞投行首個印度貸款項目獲批，[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7-05/04/c\\_129587391.htm](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7-05/04/c_129587391.htm)（查閱日期：2018年12月6日）

<sup>123</sup> 人民網，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清潔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http://energy.people.com.cn/BIG5/n1/2017/0506/c71661-29257905.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6日）

作委員會」電網管理局展開海灣地區可再生能源開發與電網互聯研究等<sup>124</sup>。可知「中國」對獨佔全球「跨境電網」的雄心與戰略意圖，亞投行將成為媒合的平臺，協助「中國」製跨境電網走出去，成為繼「高鐵外交」後下一波「中國」對外輸出的主要標的。

在國內部分，「中國」能源企業已制定相關計畫逐步實施，如「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舒印彪2015年曾向媒體透露，國家電網公司將依據遠距離、大容量、低損耗的特高壓技術來打造「一帶一路」經濟帶輸電走廊，首先實現與中亞五國的電網相聯，共享哈薩克大型能源基地和中亞豐富的風電與太陽能資源，長期或將聯通和蒙古、俄羅斯等國的電網。目前「中國」已在俄羅斯遠東地區開展1000萬千瓦的電源和電網一體化建設，未來將輸往「中國」華北地區。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帶領下，「中巴經濟走廊」能源合作、中亞五國可再生能源規劃、東協清潔能源路線圖、「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電力投資項目都已陸續啟動<sup>125</sup>，在電力輸配系統升級與電網擴建部分，作為「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基礎建設，亞投行已分別對孟加拉與印度提供貸款支持（參表三）。

2017年6月亞投行公布了「能源領域策略（Energy Sector Strategy）」，表示未來在能源領域的投資將著重保障能源匱乏地區的能源開發、輸送及安全，並提升化石能源發電站技術及水力電設施的建設和升級。亞投行「能源領域策略」支持「一帶一路」能源戰略規劃，於2016年12月貸款6億美元支持亞塞拜然提出的天然氣管線建設（TANAP）<sup>126</sup>計畫。亞塞拜然是世界重要的石油能源產地之一，石油儲量約22億噸，天然氣儲量約2.6億立方公尺；目前年產石油約5000萬噸，天然氣300億立方公尺，是西亞石油、天然氣輸出大國。2018年6月，全長1850公里、經喬治亞將亞塞拜然天然氣運送到土耳其及歐洲的「跨安納托利亞天然氣管道」（TANAP）正式開通。這是歐盟與土耳其、亞塞拜然大力推動的能源合作項目「南部天然氣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視為實現歐洲能源供應渠道多元化的重要一步<sup>127</sup>。

---

<sup>124</sup> APEC能源合作國際網，解析一帶一路峰會中的能源議題，[http://www.nea.gov.cn/2015-04/23/c\\_134177372.htm](http://www.nea.gov.cn/2015-04/23/c_134177372.htm)（查閱日期：2018年12月8日）

<sup>125</sup> 同前註

<sup>126</sup> 歐盟於2008年提出「南部天然氣走廊」計畫，設計了土耳其-希臘-義大利（ITGI）、納布科（Nabucco）、跨亞得里亞海（TAP）、白溪（White Stream）等4條輸氣管道，希望將亞塞拜然、土庫曼、哈薩克、埃及、伊拉克等國的天然氣運往歐洲，使歐盟的能源供應路線和來源多元化，從而保證歐盟的能源供應安全。

<sup>127</sup> 「中國」時報，德媒：柏林與北京成了外高加索地區的新玩家，<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24000120-260408>（查閱日期：2018年12月8日）

亞投行為連接亞塞拜然與土耳其的天然氣管道建設融資6億美元，協助TANAP項目將亞塞拜然沙赫德尼茲油田的天然氣運往土耳其，待土耳其跨亞得里亞海天然氣管線項目（TAP）於2020年完工後便可將天然氣輸往歐洲，以分散歐洲長期仰賴俄國提供能源的風險。對此歐盟能源聯盟副主席Maros Sefcovic表示，TANAP—TAP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實施將吸引鄰近地區的供應商加入，同時將加強能源安全和供應的可靠性<sup>128</sup>。

亞塞拜然總統阿利耶夫為爭取「一帶一路」資源，相應提出了復興絲綢之路的「大絲綢之路」，希望將該國打造成歐亞大陸的能源、交通和信息樞紐，於2015年12月與習近平共同簽署了《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諒解備忘錄》，標誌著兩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中合作的開始，之後亞「中」經濟在各領域積極展開對接，包括共建「中國」-中亞-裏海-亞塞拜然-歐洲的東西鐵路貨運幹線交通配套設施升級，計劃中的俄-亞-伊南北交通走廊，及農業、旅遊領域的開發合作等；2017年5月亞塞拜然國家石油公司與中石油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簽署了關於巴庫卡拉達赫區的天然氣加工和石油化工項目的投資諒解備忘錄<sup>129</sup>。未來可預期亞投行在中亞、西亞能源等基礎建設的投資將持續增長，而「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腳步也將越走越遠，越走越踏實。



---

<sup>128</sup>「中國」電力新聞網，獨家 | 歐盟如何在中亞地區尋找天然氣，<https://read01.com/DQMyej.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8日）

<sup>129</sup>工商時報，德媒：柏林與北京成了外高加索地區的新玩家，<https://m.ctee.com.tw/livenews/gj/20180824000120-260408>（查閱日期：2018年12月8日）

## 第四節 小結

亞投行作為「中國」國際金融領域的新嘗試，服膺「中國」外交戰略需要，向亞洲各國基礎建設提供資金，以促區域互聯互通及經濟一體化，在政策及執行面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互相支援、兩者關係共存共榮。亞投行成員國多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其中更不乏同時加入亞投行及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國家，如塔吉克、巴基斯坦、俄羅斯等，不論亞投行或「一帶一路」皆是習近平「大國外交」的實踐，更是周邊外交的營造與累積。十八大後習近平在「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基礎上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並將之提升至「命運共同體」層次，以凸顯全球化下議題無疆界，各國休戚與共之感。「中國」對於多邊外交及國際組織運作日漸嫻熟，首先提出「中國夢」作為戰略藍圖，接著宣傳「一帶一路」倡議並籌建亞投行，逐步落實「中國」的外交大戰略。



圖4-6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成員國（摘自網路<https://www.storm.mg/article/694456>）

亞投行成立迄今已有87個國家或地區為成員國，隨著亞投行貸款項目增加、融資規模擴大，其商機前景將不可限量，若說亞投行是「中國」走入國際金融領域的觀察點，那「一帶一路」就是「中國」企業走出「中國」、立足世界的重要管道，隨著「一帶一路」基建、交通、能源互聯互通的建設，「中國」企業透過亞投行媒合，也把握機會累積能量，在各領域創造獨佔或寡佔的地位。亞投行部分成員國雖未參與「一帶一路」，卻仍希望參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計畫，這也說明了歐陸國家紛紛加入亞投行的動機。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互相支持，戰略性連接亞洲和歐洲兩大世界的經濟圈，市場規模和貿易潛力大。目前，「中國」與絲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範圍主要包括機械設備、機電產品、高科技產品、能源資源產品等；透過與沿線國家共同開發煤炭、油氣、金屬礦產等傳統能源資源，「中國」更因地制宜地積極推動水力、核電、風力、太陽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基建，讓能源資源成為上下一體的產業鏈，促進國家間的能源資源開發、加工及工程技術。為與「中國」內部產業發展配合，協助國企向外尋找市場，建立「made in China」的國際標準與規格，「中國」透過亞投行篩選投資項目，針對利於「中國」企業發展的領域進行投資，為本國企業營造利於發展的環境。透過「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網絡，加強與沿線國家、地區的經貿合作，促使沿線國家放寬市場准入及技術標準等方面的限制，進一步為國企打開方便之門，以逐步形成「一帶一路」跨歐亞大陸的國際貿易網絡。

亞投行發言人歐若拉於2018年11月受訪時表示，亞投行在投資方面有三大優先主題，首先是透過持續性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被投資國家綠色基礎設施的發展，幫助其完成環境和發展方面的目標；其次是大力推進跨邊境連接項目，加強跨邊境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路、鐵路、機場、能源管道以及通信設施等；第三是設計創新型解決方案以動員私人資本，並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政府、私人金融家等進行合作，減輕多邊開發銀行和私營企業投資風險，從而更有效地集中私人企業資本<sup>130</sup>。亞投行未來將擴大投資地區，在有助於亞洲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不排斥擴大投資域外國家，如對埃及的投資即是一例，隨著「一帶一路」往歐洲邁進，亞投行也將持續推進對域外國家的投資及納員。亞投行目前已在制定有關「其他生產性行業」的投資戰略，包括礦業、農業、通信行業和製造業等，可預期亞投行投資的領域也將更趨多元與豐富。

---

<sup>130</sup>人民網，亞投行發言人歐若拉：亞投行多方位發力助推亞洲發展，<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1/14/c1002-30401224.html>（查閱日期：2018年12月8日）

## 第五章 亞投行對國政經秩序的影響

二戰後美國透過布列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元獨佔地位，並透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組織延伸其意志及影響力，主導金融相關規範及建制；地區則透過忠實盟友日本掌握亞銀為其發聲，長期獨佔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如今「中國」主導成立之亞投行，正試圖挑戰美國創建之多邊治理及金融秩序，引起了美國等現狀大國的關切與不安；反之，新興經濟體與南方國家地位及國力的提昇，如「中國」及印度，讓彼等國家更有自信積極地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制度的改革及規則的制定。「中國」籌設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貸款對象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是其外交核心「南南合作」的升級與實踐，2013年習近平假印尼首度提出亞投行倡議，獲得東南亞各國熱烈響應，傳統大國印度更積極爭取主導地位，相較美、日等亞太已開發國家抵制，印度身為發展中國家、亞投行第二大股東，對亞投行的態度殊值關注。

### 第一節 美國、日本與印度對亞投行的立場與因應

#### 一、美國的立場與因應

延續既有優勢，擴大與其他國家國力差距，維持領導地位，是美國不變的核心利益。然而面對「中國」崛起進行式，及G2時代來臨的國際現實，美國對國政經地位的鞏固將更趨積極與強勢，由此可知「中國」籌設亞投行之舉對美國而言，無異是對現狀的挑戰，危及美國根本利益。美國素來具有反對東亞金融「建制」的戰略傳統，且長期透過維持東亞地區的經濟破碎來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1997年日本曾提出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構想，希望藉此彌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功能上的不足，但該計畫遭到美國公開反對而流產<sup>131</sup>。對於「中國」籌設亞投行，公開以領導姿態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美國必然視為威脅而大力防堵。亞投行係「中國」欲與全球性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及區域性的亞洲開發銀行爭權的利器，「中國」在其中所佔股權居首，雖隨著成員國加入而漸遭稀釋，但仍擁有高達26%的總投票權，等同擁有一票否決權；另亞投行協議明定由發展中國家主導，故限制域外國家持股比例（25%），使英國等歐陸國家雖享有創始國投票優勢，仍難在表決

<sup>131</sup> William W. Grimes,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4.

時發揮足夠之影響力。今美國已失去成為亞投行創始國的機會，加上制度設計制約，即便其現在加入亞投行，地位及話語權也難與「中國」一較高下，在缺乏誘因的情況下，美國將不會輕易加入亞投行。

「中國」提出亞投行倡議之初，美國曾批評這是「中國」在蓄意削弱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功能，歐巴馬政府官員也曾表示：「擔心『中國』領導下的新銀行會不顧目前在發放貸款上的保護措施，比如為了追求發展迫使弱勢群體離開自己的土地等<sup>132</sup>」。美國除了公開批評，更重要的抵制行動就是遊說自己的盟國不要加入亞投行。其中日本、韓國和澳洲就是美國極力遊說的對象，因為如果這三個亞太經濟大國不加入亞投行，亞投行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就會遭到質疑與弱化。也正是因為美國的壓力，韓國和澳洲在2014年一直沒有承諾加入亞投行，直至2015年3月英國宣佈加入後，韓、澳兩國才公開表態加入<sup>133</sup>。對於美國抵制亞投行的外交失敗，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曾深刻地表示：「2015年3月將是美國失去全球經濟體老大地位的歷史時刻<sup>134</sup>」。根本而言，美國抵制亞投行的失敗體現了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三重困境：金融地位的下降、提供金融公共財能力的不足，及控制國際金融制度的合法性遭到質疑。

美國歐巴馬政府在自知無力阻擋亞投行成立後，轉而透過制度面要求「中國」進行亞投行內部規則的調整，以與現行制度接軌。如美國前財政部長路傑克（Jack Lew）曾公開對亞投行的治理程序、管理借貸透明度及環境和社會保障等制度提出質疑，認為無法符合國際高標準，並以此論點遊說美國盟友三思而行<sup>135</sup>，同時路傑克也在《外交事務》期刊上撰文指出，亞投行等新機構的創立雖使「中國」在國際金融結構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但亞投行仍應遵守世銀及區域發展銀行已設下的標準，才能強化現有全球金融結構<sup>136</sup>云云，試圖鞏固美國似在走下坡的金融霸主角色。

---

<sup>132</sup> Jane Perlez, “Stampede to Join China’s Development Bank Stuns Even Its Founde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2015, A5.

<sup>133</sup> Jane Perlez, “U.S. Opposing China’s Answer to Worl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4, A1.

<sup>134</sup> 金融時報中文網，「中國」推動美國走向金融洗牌，<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920?page=2>（查閱日期：2018年5月23日）

<sup>135</sup> 自由時報，亞投行年底成立透明度受質疑，<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65116>（查閱日期：2018年5月23日）

<sup>136</sup> 自由財經，美財長：亞投行應遵守國際標準，<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978493>（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積極融入國際金融制度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擴大國際參與的主要方式，美國係現行國際金融制度的塑造者和主導者，此一態勢使國際金融制度和美「中」兩國這三者之間形成一種互動的邏輯關係：美國與國際金融制度存在控制、使用與反控制、約束的關係；「中國」與國際金融制度則是融入、改善與滲透、影響的關係；在制度規定的範圍內，美「中」之間係美國藉由國際金融制度影響「中國」，「中國」則對美國也有反作用的關係<sup>137</sup>。作為主導創建國際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國一直設法維護和延續其優勢地位，面對「中國」等制度的後來者，往往採取引導和遏制的手段，以利將之納入美國主導下的金融體系；對於正在崛起且實力持續增長的「中國」而言，則是以爭取與美國等制度先行者對等的國際地位並節制美國的單邊行為，以及逐漸擴大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作為融入現行國際金融制度過程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標<sup>138</sup>。

亞投行作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融資機構，對「中國」拓展地緣政經影響力重要性不可或缺，「中國」藉著「一帶一路」戰略一面振興國內產業，一面協助周邊國家基建發展，除有助其改善與周邊國家外交關係，更有助「中國」勢力進一步深入歐亞大陸及東南半島，強化其區域領導地位，構築成防衛美國、促進周邊環境和平穩定之戰略佈局。

美國慣用胡蘿蔔和棒子兩手策略處理涉外事務，不會只使用硬權力的「圍堵」(containment)或「遏制」，或是軟權力的「接觸」或「交往」(engagement) 政策，而是兩者同時進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曾將此軟硬兩手的策略稱之為「圍和」(congagement)。不論是「遏制」、「交往」抑或是「圍和」策略，美國仍會因為主觀需求與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有所偏重，在本質上，美國都希望能夠透過和平演變「中國」的方式，引導「中國」朝向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民主化方向發展，藉以轉化「中國」崛起對美國造成的潛在威脅。在此一致性的「中國」政策下，美國一方面設法維持區域權力的平衡，避免「中國」危及美國霸權；另一方面則採取整合手段，積極引導「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使其接受國際規範的制約而成為美國主導國際秩序下負責任的成員。

美國自川普就任總統後，政策以「美國優先」為出發點，加上川普商人性格，重視利益成效勝於制度威信的建立與維持，對於亞投行立場也更加彈性；在戰略層面，為節制「中

---

<sup>137</sup>楊文靜，「中國」融入國際機制與美國因素，《現代國際關係》，第10期（2004），頁144-159

<sup>138</sup>張君傑，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之政經競合-以結構現實主義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106年7月，頁47



國」 「一帶一路」 及亞投行政經影響力溢出效應，川普與日本提倡自由開放印太戰略，積極拉攏印度與澳洲，擴大美國對印度洋及南海周邊的掌控能力，壓制「中國」戰略崛起；在國際金融層面，美國國會通過IMF及世銀的改革方案，對新興經濟體釋出利多，滿足彼等國家對話語權及地位的要求，同時透過既有國際多邊金融組織及國際評比機構引導及監督亞投行運作，維護美國創建的國際規則與典範，避免美日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存在感下降，而「中國」地位在亞投行的作用下放大。

## 二、日本的立場與因應

與美國同樣身為國際金融領域的既得利益者，日本對於亞投行的態度充滿防衛，作為美國亞太忠實盟友、亞銀的領導者，日本的亞投行政策有其侷限性。因為早期對於亞投行成立的誤判、對於恐失去亞洲大型基建商機的焦慮，加上後期國內政黨要求政府加入亞投行的聲浪漸大，使日相安倍對亞投行立場出現前後不一致的情形。在2015年3月12日英國宣布加入亞投行創始國後，德、法、意等歐盟大國，和美國亞太盟友澳洲、韓國等，都如雪崩似地紛紛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行列，令政策緊隨美國腳步的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焦慮與孤立之中。同年3月20日，一直以亞投行操作規則不透明而持反對態度的日本副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壓力下，暗示如果可以確保融資審查的透明性，不排除磋商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sup>139</sup>，然此言論被外界解讀為日本政府緩解國內壓力之舉。

另一方面，為與亞投行互別苗頭，爭取亞洲基建融資的主導權，日本政府相應提出了基礎建設的「品質」概念，欲與「中國製造」做出區隔。2015年5月3日日本副相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政府將與日本企業一起，加大對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亞洲高質量經濟增長作出貢獻；日相安倍晉三在同年5月21日電視演講中，公開對外宣稱將提出一項為期五年(2016~2020)的計畫，融資規模比過去五年增加30%，提高到1,100億美元，其中包括擴增亞銀50%的貸款額度，並進一步提高亞銀的法定資本和日本政府所提供的日圓貸款，以助亞洲基礎建設之未來<sup>140</sup>。由於5月20日恰逢亞投行假新加坡召開第五次籌建代表會議之際，加上日本提出之1,100億美元恰比亞投行之1,000億美元融資規模大，日本政府此舉也等同向外界

<sup>139</sup> 毛峰，日本患上亞投行焦慮症，《亞洲週刊》，第29卷15期（2015年4月19日）

<sup>140</sup> 自由時報，對抗亞投行日5年砸1100億美元，<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82467>（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宣示其政策立場，證實日本將與「中國」爭奪基建市場的主導權。面對「中國」近年低價搶奪東亞基建大餅，日本接連因成本難以壓低而挫敗，如印尼高鐵訂單由「中國」得標等，日本政府已苦思因應對策，是以此次提出高品質基建除了反應日本自身的理念，也是滿足振興國內經濟的需求，更隱含日本政府與「中國」力爭區域金融主導權的戰略目標與作為。為宣傳「高品質」基建理念，日本政府也運用APEC資深官員會議場合推動「品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 : Investment for Asia's Future)，其內涵包括(1)全面運用日本經濟合作各項工具推展和加速援助；(2)強化日本和亞銀之間的合作；(3)強化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BIC)之功能；(4)推動「品質基礎建設投資」作為國際標準等<sup>141</sup>，積極拉攏東南亞國家以突破「中國」對該區域基建市場的壟斷。

面對國內經濟發展需求及被區域「孤立」的風險，日本對加入亞投行與否始終莫衷一是，扮演印太戰略及全面性泛太平洋夥伴協議(CPTPP)的主要提倡者，日本既憂心搭不上「中國」帶動的亞洲經濟列車，又恐淪為美國戰術運用的棋子，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及川普善變風格的不確定下，增加了日本政策制訂的困難度。

### 三、印度的立場與因應

印度與「中國」的龍象情結由來已久，邊界土地問題加上大國自尊使得「中」印關係充滿變數。然身為發展中的南方國家，印度內部對基建融資的需求及經濟增長方面的壓力自是不在話下，印度官方稱，該國2014年~2018年基礎設施資金缺口約為1兆美元，自此可理解印度對「中國」籌設以發展中國家為營運主體的多邊開發銀行，及其服務基礎建設的功能當然有支持的理由。在國際地位、發言權提升及基礎建設資金的需求等現實利益考量下，印度自亞投行籌設初期便大力支持且積極爭取主導地位，身為亞投行第二大股東及獲貸款項目最多的國家，印度對亞投行的戰略目標及利益十分明確。

不論是印太戰略或是「一帶一路」，印度皆居中扮演要角，是「中」美積極爭取的對象，印度總理莫迪也深諳此道，適度創造戰略模糊以坐收漁翁之利。據統計迄今在亞投行核准的貸款資金中，印度占比1/4，總額高達15億美元，其數額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然而對於「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印度卻公開表示反對，憂心「中國」透過「21世紀

---

<sup>141</sup>余慕蕪，運用APEC場合爭取基礎建設商機—兼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與日本倡議「高品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臺灣經濟研究月刊》，38卷11期(2015/11/01)，頁87-93

海上絲綢之路」深入印度勢力範圍；陸地部分尤其是「中巴經濟走廊」的興建，規劃取道印度及巴基斯坦領土紛爭之地喀什米爾，更對印度形成主權侵犯及戰略壓迫。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阿莉薩·艾爾斯(Alyssa Ayres)表示，雖然印度與「中國」有著活躍的經貿往來，「中國」也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對於「中國」在整個印度洋不斷擴大的角色，印度卻深感憂慮，特別是「中國」在吉布地的首個海外軍事基地，及與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密切關係。考量「中國」勢力日益擴張，印度在2018年1月27日與地處印度洋重要航道的塞席爾簽署了租借阿索普申島20年的租約，並計劃在該島修建飛機跑道和港口，被外界視為是對「中國」的戰略反制<sup>142</sup>。

印度外交長期奉行不結盟政策，以推動印度洋多極化為主要目標，然面對「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壓迫，印度也逐漸調整與美、日的合作關係，在軍事層面加強互動，進行聯合軍演，壓制「中國」在印度洋的軍事擴張。但礙於國內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印度也極力克制，在美、「中」間保持一定的戰略模糊，其外交政策「經濟傾中，軍事傾美」態勢明顯。



---

<sup>142</sup>美國之音，學者稱印度和「中國」正陷入冷戰式關係，<https://www.voacantonese.com/a/india-china-20180205/4240960.html>（查閱日期：2018年6月23日）

## 第二節 亞投行對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

國際制度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一國能否參與制度的建立，是決定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關鍵指標。「中國」有感美國主導的金融秩序忽略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與發言權，故而籌設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亞投行，透過保障彼等國家的主導權以充分體現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亞投行制度面的革新雖挑戰了美國建立的制度，但卻未從根本上改變全球治理的現狀，其所反映的是「中國」的利益與外交戰略透過亞投行已漸為其他國家所接受，衝擊了美國獨大的國際金融秩序。

### 一、對國際制度的挑戰

「中國」自參與國際組織以來，逐漸學習其運作模式，有感國際社會透過多邊外交對捍衛及創造國家利益之關鍵角色，「中國」近年積極在國際組織爭取發言權及領導地位，手段包括在組織中培養親「中」勢力及設法增加投票比重等。「中國」於體制內改革的動作不斷，同時也開始嘗試籌建新的國際建制，如亞投行。亞投行是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成立的多邊開發銀行，其制度規劃多以發展中國家角度出發，並設置排除域外已開發國家干涉治理的安全機制，以確保彼等國家主導權。其制度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即是取消貸款的「政治條件」，一改既有多邊開發銀行以援助貸款作為傳遞西方價值觀及改善受援國內部政經環境的做法。

世界銀行等機構長久以來因貸款條件嚴苛、貸款程序繁瑣、未能充分考慮貸款國家實際情況等問題而廣受詬病，其基於「華盛頓共識」而在貸款中附加的私有化、放鬆管制等政治性條件尤其遭到批評。然而「政治條件」是多邊開發機構給予貸款的主要特徵，即貸款國必須按照貸款組織的要求調整其相關政策，以因應可能面臨的還款問題，此類條件涉及不僅是該國償還貸款的保證，還是貸款組織落實對其政策監督的重要途徑<sup>143</sup>。作為幫助貸款國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手段，其貸款條件通常包括財政節儉（增加稅收、削減開支等）、貨幣政策緊縮（提高利率、限制信貸創造等）和進行結構性改革等（私有化、放鬆監管等）。姑且不論這些措施對於改善貸款國經濟狀況的效用，單就政治和法律層面而言，其無疑構成對貸款國內政的干預及主權的限制；尤其當貸款國為小國、弱國時，因需要

<sup>143</sup> 廖凡，國際貨幣體制的困境與出路，《法學研究》，第4期（2010年），第197頁

往往更難對貸款組織提出的條件進行議價<sup>144</sup>。亞投行對貸款規則的創新將衝擊既有多邊金融機構貸款規則的一致性，使兩者在爭取貸款國方面形成競爭關係，也將動搖美國建構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原則的自由經濟理念，激發各界對國際組織要求受貸國接受政治條件合法性的爭議與反彈，侵蝕美國長期樹立的貸款制度與國際標準，抵銷歐美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政經改革的努力。

亞投行作為多邊開發機構的後起之秀，在制度面必須避免與現行規範扞格，因此在營運模式、貸款審議、投票權設計、內部資訊透明度等部分往往被放大檢視。亞投行在籌設之初，美國便極力阻撓，尤其對其內部治理提出高度懷疑，盼歐陸國家共同抵制，最大原因即是對國際制度及金融主導權的捍衛。亞投行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設計，本質上奠基於對既有體制的反思與改革，故在與現行制度的整合，及與既有機構的合作都是亞投行持續茁壯與發展的考驗。

國際制度競爭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制度的治理結構，包括成員組成和權利結構。由於制度本身的惰性以及主導國私人利益的考量，制度結構的改善常跟不上國際形勢的變化，導致不少國際制度呈現成員組成和權利結構失衡的情形，例如部分合格國家難以加入某種國際制度並享有相應的權利，或是部分國家在某種國際制度中長期享有「過度特權」等<sup>145</sup>。目前美「中」制度主導權之爭尚不明顯，因為「中國」對於國際制度的創建仍處於學習階段，然制度主導權之爭一旦被激化，也可能演變為不同意識形態團體的對抗，如同冷戰期間，美蘇在經濟領域建立的兩個平行市場，終因封閉、互斥而演變為集團間的經濟對抗行為。目前「中國」代表的開發中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雖然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對於金融制度也有不同意見，但該分歧點並非彼此互斥且扞格，故可透過協調機制進行制度的改革與調整，「中國」也未放棄透過此機制主張自己的權利。

亞投行是「中國」創新制度的嘗試，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曾多次公開表示，亞投行將借鑒世銀和亞銀的優良制度，且積極與彼等多邊開發機構合作。經統計，截至2018年1月，亞投行投資的24個項目中，有8個和世銀聯合融資，有3個和世銀集團下屬的IFC聯合融資，有4個和亞銀聯合融資，另外還有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聯合融資的項目各1

---

<sup>144</sup> 壹讀，比較視野下的亞投行貸款條件研究，<https://read01.com/jDGME3.html#.W8HuFi33UWo> (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sup>145</sup>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國際制度競爭，《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16年），頁20

個<sup>146</sup>，顯示亞投行並非閉門造車，自外於既有多邊開發機構，而是在既有制度上進行對發展中國家有利之創新，降低制度相容之困難度。同時亞投行也廣泛雇用國際人才，目前亞投行的5位副行長分別來自英國、德國、印度、韓國和印尼，且現有的150人左右營運團隊中，中方工作人員僅佔25%，其餘僱員分別來自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充分展現亞投行多元及包容的特質。自亞投行成員國觀之，包含發展中與已開發國家，且成員仍持續增加，顯示亞投行制度被接納與認可的程度正不斷提升。

## 二、對多邊治理的挑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了具有多邊主義特色的全球治理體系，即透過國際組織制定制度與執行規則，並賦予制度的正當性與行動的合法化，這包含了以安理會為核心的聯合國集體安全架構；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為支柱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與七大工業國會議為首的全球經濟治理；以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難民總署、國際紅十字會等聯合國專門機構與非政府組織所組成的社會、發展治理框架等，在過去70多年來發揮了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功能。這些由西方歐美國家籌組的「俱樂部模式」(club model)機制，主導了全球政治、經濟、金融貿易等領域發展的遊戲規則，凸顯西方治理模式對國際社會無遠弗屆的影響。

西方治理模式在冷戰結束後，因為經濟全球化為核心的全球化態勢，以及發展中國家實力提升的兩大因素影響，出現了全球「治理赤字」的危機，全球化的結果促使國家主權部分讓渡給國際組織與全球市場，並表現在國際各領域的多邊制度與體系所構成的龐大網絡，但也引發了經濟、環境生態、地緣政治、貧富差距、南北發展等危機。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催化了全球治理的轉型，在七大工業國會議與布列頓森林體系失靈下，二十國集團(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藉由G20啟動的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發展中國家漸已取得提高布列頓森林體系內，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份額與投票權的契機，二戰結束以來

---

<sup>146</sup> FT中文網-亞投行投資項目的六大特點，<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75907?full=y&archive> (查閱日期：2018年10月15日)

「俱樂部模式」的多邊制度運作也逐漸失去其正當性<sup>147</sup>，「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層面角色漸重。

「中國」逐漸意識到其內部挑戰與外部挑戰的關聯性，加上其在國際上的利益日益增加，作為國際體系中利益的攸關者，「中國」漸發展出一套參與全球治理的模式。儘管「中國」對全球治理融入日深，但對於限制國家主權及利益以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中國」對於維護主權的堅持仍遠高於其他國家<sup>148</sup>。由於「中國」對全球治理的認同與參與方式不如西方國家長久，且未經歷西方國家多邊制度發展的歷程，故對其制度核心及價值認同偏低，反而是以謹慎、防衛且條件性地態度學習、融入國際多邊制度，因而與西方的治理模式出現差異。同時，「中國」作為19世紀的西方殖民主義受害國，以及20世紀以來西方所主導具自由主義特色的國際體系的後來參與國，儘管加入現有的國際制度，然對於國家主權的維護，仍是其對外政策最重要的指導原則，亦是對於西方國家進行失敗國家 (Failed state)的國際干預，以及廣泛意義上的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則等挑戰<sup>149</sup>。

「中國」與傳統美歐國家對於多邊主義的認識不盡相同，因而產生了隱含不同戰略意涵的全球治理觀。美歐西方國家期望建立的國際秩序，是基於西方冷戰以來的多邊治理安排，並維持西方國家在國際規範上的塑造者角色。因此傾向以現存的國際多邊制度維護西方在國際社會上的規範性角色<sup>150</sup>，同時強調國際秩序要建立在西方國家所倡導的規則基礎上，在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裡，愈能採用多邊制度的方式且愈多參與的夥伴，解決方案可能就越有效<sup>151</sup>。「中國」對全球治理的理解更多是來自於多邊外交，並將其視為推動多極化世界的方

---

<sup>147</sup>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Roger B. Porter et al., eds., *Efficiency, Equity, Legitimacy: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t the Millenniu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1), pp. 264

<sup>148</sup> Eva Gross & Junbo Jian, "Conceptual Gaps on Global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in Zhongqi Pan, ed., *Conceptual Gaps in China-EU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Human Right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2), p. 213.

<sup>149</sup> 在西方自由主義退卻的時代，儘管「中國」等非自由民主國家與西方國家在短期內可共存於自由國際秩序中，但長遠看自由民主國家仍將再取得優勢。請見Robin Niblett, "Liberalism in Retreat: The Demise of a Dream,"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 17-24.; Joseph S. Nye, Jr.,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 10-16。

<sup>150</sup> Geeraerts, "China, the EU, and the New Multipolarity," *European Review*, Vol. 19, Issue 1, February 2011, pp. 59-62.

<sup>151</sup> Volker Stanzel, "The EU and China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2008), p. 259.

式<sup>152</sup>，認為制度化的國際秩序將能抑制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而絕對主權原則是接受全球治理及多邊外交的前提。「中國」希望建立起一套基於權力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國際秩序，此因歷史殖民侵略的記憶，使得「中國」尤其重視主權與獨立地位，認為一個多極化世界更有利於維持自身利益<sup>153</sup>。對於北京而言，亞投行設立固然為強調全球治理體制轉型，以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並以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為目標，然更重要的是，避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等機構干擾了公平運作的制度，影響「中國」的國家利益。

### 三、對國際貨幣的挑戰

人民幣國際化是習近平推動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步驟，而亞投行則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推手。「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將自沿線國家開創龐大的基礎建設商機，亞投行居中扮演融資貸款角色，並透過公私夥伴關係(PPP)引入「中國」企業輸出國內過剩之生產力。目前亞投行交易雖以美元為主，但仍鼓勵使用人民幣計價，隨著人民幣使用的範圍及頻率擴大，透過貨幣外部性的特質，只要人民幣的交易與使用量超過一定比例，貨幣用量的成長速度將會倍數增長，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目標的達成<sup>154</sup>。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將優先達成人民幣區域化的階段目標，檢視「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迄今，與「中國」簽訂貨幣互換協定的國家迅速增加，如南韓、新加坡、阿根廷、瑞士、日本、俄羅斯、埃及、英國等國，可預見在國際貿易上以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之比例將隨之增加<sup>155</sup>，不僅提高人民幣在海外市場流通與交易量，亦擴大人民幣在全球市場的需求<sup>156</sup>，使之成為亞洲的主導貨幣之一，而

---

<sup>152</sup> Xiaoming Zang, "Multipolarity and Multilateralism as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in Zhongqi Pan ed., *Conceptual Gaps in China-EU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76-177.

<sup>153</sup> Charles Grant & Katinka Barysch, "Can Europe and China Shape A New World Order?" *London: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2008), pp. 79-81.

<sup>154</sup> 吳明澤，「一帶一路」、亞投行與人民幣國際化，《經濟前瞻》，(2016.1)，頁84

<sup>155</sup> 王鵬，「中國」新視野-「一帶一路」助人民幣國際化，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26000101-260203>(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sup>156</sup> 魏盛峰，人民幣的升值不歸路，簽署貨幣互換機制，企圖擺脫美元牽制，財訊快報，<http://www.investor.com.tw/onlineNews/freeColArticle.asp?articleNo=1783>(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優先形成一個人民幣貨幣區<sup>157</sup>；「中國」與沿線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議有利減少全球貿易對美元作為國際流通與儲備貨幣的依賴，進而削弱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影響力及代表性。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2018年8月報告顯示，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但它只占全球跨國支付總額的2.12%<sup>158</sup>，其流通性仍有待提升。人民幣若要作為國際主要交易貨幣，「中國」必得放鬆對金融市場的箝制，推動外匯與匯率的自由化，同時放鬆對國際收支帳的管制<sup>159</sup>。近年「中國」有系統地推廣人民幣，由管制封閉逐漸走向開放自由，其改革步驟循序漸進且是分項分時分區進行，2015年之前，「中國」聲稱其推動措施為「人民幣跨境使用」，2015年6月後官方才開始使用「人民幣國際化」等字眼，可見其開放先後有序，對人民幣戰略雛形也逐漸浮現<sup>160</sup>。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美元的信用一度出現動搖，讓大量持有美元的「中國」開始思考避險措施，促成了「中國」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契機。在當時，主要目的是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以避免人民幣價值和國內企業營運受到匯率的影響，屬於防衛性的措失。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一步在於2015年成功加入IMF特別提款權 (SDR)的一籃子貨幣，該政策於2016年10月1日生效，使人民幣正式成為國際貨幣基金 (IMF) 特別提款權 (SDR) 一籃子貨幣之一，權重10.92%，僅次於美元41.73%及歐元30.93%，可謂人民幣國際化里程碑，象徵其價值獲得國際社會的認證。

由於SDR為IMF所創立之國際儲備資產與記帳單位，且被用於國際支付的特別手段，人民幣得以納入，代表其作為國際貨幣之適性得到了認定。但若人民幣要作為國際貨幣及儲備，與美元地位一爭高下，「中國」必得進行經濟及金融治理的改制，推行必要的法律、政治及機構改革以獲得國際投資者的信任，然大規模地改革與放鬆對內金融管制卻恐動搖「中

---

<sup>157</sup> 袁博，「一帶一路」助推人民幣區域化，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finance/6k3zr93.html> (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sup>158</sup> 中時電子報，全球外儲占比人民幣4連升，<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02001068-260203> (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sup>159</sup> 賽明成，顛覆「中國」？透視「亞投行債券」與「帶路基金」，《問題與研究》，第54卷第2期 (民國104年6月) (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sup>160</sup> 工商時報，人民幣國際化之今昔軌跡，<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03000336-260202> (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國」的統治框架與基礎，其風險及潛在的後果影響深遠<sup>161</sup>。因此人民幣的定位應是構築作為國際貨幣流通的「非美元經濟圈」，而目前「中國」領導層的雄心尚不在抗衡美元，及籌謀最終在國際貨幣體系取而代之，而是在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替代性貨幣，有別於當前美元獨大的現狀，此規劃與「中國」外交推動多極化格局理念亦不謀而合，亞投行自詡為既有多邊開發機構的補充而非取代，「中國」對人民幣的短期規劃應也是如此。

#### 四、對美國金融地位的挑戰

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為尋求更合理的國際金融制度與秩序，不斷在國際金融組織中要求相應的話語權與地位，其積極作為包括爭取國際組織中的重要職位，如2008年「中國」籍的林毅夫被世銀行長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任命為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成為首位被世銀任命的發展中國家人士；與新興國家合作推動全球治理的改革，促使世銀推動改革計畫，包括提升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參與權及發言權等。2010年世銀發展委員會批准了G20匹茲堡高峰會議的承諾，通過了世銀的改革方案，即已開發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3.13%的投票權，使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投票權提升至47.19%，其中金磚國家的投票權提升到13.1%，「中國」的投票權則從2.77%提升至4.42%，成為世銀中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股東<sup>162</sup>。此番改革反映了新興國家增長的經濟實力，也暗示歐美國家因經濟疲軟而漸在金融組織陷入治理困境的情形。

2012年世銀行長金墉 (Jim Yong Kim) 提出了全面性的世銀改革計畫，強調創造更為包容開放的世界銀行<sup>163</sup>。2015年底「中國」成立了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的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並在其中佔有一半以上的出資比例，成為實質投票權最高的國家。「中國」領頭，主導了亞投行的制度設計，包括以會員國國內生產毛額為依據分配投票權、限定域外國家投資比

---

<sup>161</sup> 紐約時報中文版，國際化的人民幣能成為下一個美元嗎？<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51201/c01up-china/zh-hant/>(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sup>162</sup> 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遠景基金會季刊，18卷2期(2017)，頁12

<sup>163</sup> 2016年9月27日，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一致同意，任命現任行長金墉連任第二個為期五年的任期，新任期從2017年7月1日開始至2022年。請見 The World Bank, "Statement by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Jim Yong Kim on Appointment to a Second Five-Year Term," September 27, 2016, Accessed, The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6/09/27/statement-by-world-bank-group-president-jim-yong-kim-on-appointment-to-a-second-term>>。

例僅能佔亞投行總資本額的25%、不設立常駐董事會等等，均是在保障發展中國家權益，防堵歐美國家干涉亞投行內部治理，此外亞投行在貸款方面標榜不設立政治條件的作法，對歐美國家長期用來影響發展中國家政經治理的手段更是一大打擊。亞投行不只在規則上突破既有框架，在代表性及國際認同上亦讓美國深感威脅，2015年英國等歐洲國家無視美國反對而紛紛加入亞投行創始會員國之舉歷歷在目，反映出美國領導力衰弱導致傳統西方盟友態度轉向之國際現實。美國自2008年次級房貸風暴後，國內經濟復甦緩慢，雖身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成長之領頭作用卻逐年下降，難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一較高下，同時美國還需應付「中國」結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提出改革國際金融組織及籌設新型金融機構的行動，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更加凸顯了美國金融霸主地位動搖的現況<sup>164</sup>。「中國」透過亞投行推動基建計畫促進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對美國霸主地位的挑戰，也是對「中國」周邊外交的有力突破。



---

<sup>164</sup>蔡明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牽動的地緣政經效應，<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273008> (查閱日期：2018年7月23日)

### 第三節 亞投行的挑戰

作為一個新興的金融崛起國家，「中國」面對不合時宜的現行國際制度及規範有兩種戰略選擇：一是改革既有制度，使其服膺「中國」利益與需要，二是創建新的國際制度，量身打造更為適合「中國」長期發展的外在環境。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相繼籌設絲路基金與亞投行等作為金融輔助機構，其中亞投行更被視為「中國」創建金融制度的濫觴，聲勢與傳統金融大國主導之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漸有並駕齊驅之勢，然而亞投行自2016年營運至今不過短短三年，其制度設計優劣及營運成效尚待時間檢驗，以下茲彙整亞投行營運迄今引發之外界挑戰如次：

#### 一、亞投行成員缺乏主要經濟大國恐影響代表性

截至2018年10月，亞投行成員國數目已達到87個國家與地區，遠超過日本主導的亞銀。亞投行成員範圍遍布六大洲，七大工業國中更僅剩美國及日本尚未加入，但由於美日名列全球第一及第三大經濟體，又是傳統金融領域的先驅國家，對亞投行的評級與實質影響遠超過其他國家，故作為國際性的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仍積極爭取美國與日本加入。客觀而言，亞投行成員的多樣化及代表性不僅意味著其所承擔的功能、理念與價值觀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更能夠增加亞投行作為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公信力，有助其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相互合作，促成制度面及營運面最大限度的整合<sup>165</sup>。

#### 二、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回收不易

亞投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投資標的，但是基礎設施資金需求大、實施週期長、未來收益難以評估等特性，往往令投資單位卻步，加上基礎設施缺乏的國家往往充斥生產力低落、人才素質不佳、政治環境不穩定及貪污情形嚴重等內部問題，徒增潛在投資風險。《經濟學人》曾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信貸風險，其中阿富汗和伊拉克因長年戰爭及內部動亂，整體風險評估最差，中亞國家塔吉克和烏茲別克風險評估次之，彼等國家均是亞投行可能投資的對象。此外，發展中國家因國內因素主動或被迫中止貸款的情形屢見不鮮，如

<sup>165</sup>吳若璋，「中國」大陸倡設「亞投行」的策略、發展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3期，頁59

2015年1月斯里蘭卡的新總理當選後，重新審查了「中國」在首都投資的14億美元港口建設案，同時要求港口建設工程停工，造成開發廠商的建設成本大增；2015年2月柬埔寨政府宣布暫停「中國」在柬埔寨4億美元的水壩工程建設案，並表示至2018年以前不會開工；2014年5月越南發生排華暴動等<sup>166</sup>，種種均是亞投行貸款可能面臨之潛在風險，恐影響其未來成本回收及營運收益。

### 三、亞投行訊息公開及監督機制未臻完善

《亞投行協議》對於訊息公開及監督機制設計不良，已引發外界對其治理透明度的質疑；如沒有明訂理事會對高風險項目進行審議前，應對關鍵項目文件提供公告期，此作法引起相關利益團體的不滿，強烈要求亞投行比照世銀與亞銀的處理方式，針對關鍵項目文件訂定公告期。另亞投行理事會在2018年4月通過全新的「問責框架」，將某些項目的審批權授予銀行的管理層，此作法也引起60多個民間組織提出抗議，認為有嚴重瑕疵，因為此舉等同給予理事會向其所代表的政府及股東規避責任的機會，不但容易使亞投行貸款審議蒙上不公正的陰影，也容易衍生違反其協議主張之環境與社會標準的潛在風險。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曾表示，亞投行將秉承「精幹、清潔和綠色」的原則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持續發展而不留下環境足跡，同時亞投行的能源策略也明載對《巴黎氣候協定》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支持，然究其投資項目及歷程看來，亞投行堅守的環境承諾已出現裂痕。例如，亞投行日前注資「新興亞洲基金」（Emerging Asia Fund，簡稱EAF），該基金由世界銀行私營借貸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管理，但由於亞投行不會對「新興亞洲基金」資助的項目進行環評與監督，使得具爭議性項目有機會透過「新興亞洲基金」注資而間接得利。據「銀行信息中心」歐洲分部（Bank Information Center Europe）和「國際普惠發展組織」（Inclusiv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發佈的一份全新報告顯示，亞投行對「新興亞洲基金」的投資使得緬甸一座煤礦產量翻倍<sup>167</sup>，凸顯亞投行在監督機制及訊息公開層面的不足。

---

<sup>166</sup>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看臺灣金融業的機會與挑戰，中華民國104年11月，頁112

<sup>167</sup> Kate Geary，亞投行需要落實監管，保證言行一致，中外對話，<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0692-The-AIIB-needs-to-deliver-governance-to-match-its-rhetoric>（查閱日期：2018年10月15日）

#### 四、美、日等國之反制作為

為反制「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及亞投行，美國在2018年4月同意世銀130億美元的增資計畫，即是由股東國向世銀的主要機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及旗下專營私人機構的國際金融公司（IFC）分別注資75億及55億美元，作為換取世銀修訂貸款規則的條件。以往各國在世銀貸款的利率差異不大，導致貸款側重於「中國」及其他較大的新興市場國家，此次世銀調高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借貸利率，主要用意即是在避免它們過度借貸，估計「中國」將因此被劃入一個貸款利率更高的新組別。據世銀資料顯示，106年「中國」是IBRD最大借款國，獲得24億美元資金，在IBRD放貸總額中佔比11%，超過其向全球教育和衛生計畫提供的資金。增資後「中國」於世銀旗下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股份將由4.68%上升至6.01%；美國則由16.89%微跌至16.77%，但仍享有否決權<sup>168</sup>。

世銀總裁金墉（Jim Yong Kim）表示，「中國」和任何中高所得國家都不會對貸款成本將攀升的前景感到高興，但他們之所以點頭同意是因為整體可借貸的資金增加；增資後世銀每年平均放貸金額可以從2017年的600億美元，以及2018年預期的800億美元，提高至1000億美元，且持續至2030年止。然以世銀改革方向看來，在貸款利率相應提高下，「中國」貸款的成本將大大增加，不利其資金調度及融資，間接影響「一帶一路」戰略推動所需的資金。

美、澳、日等國於今(2018)年7月甫建立三方合作夥伴關係，宣示未來將共同投資印太地區基礎設施和開發計畫，以遏止「中國」藉由「一帶一路」戰略為相關基建工程提供貸款，並藉此累積在太平洋地區的政經影響力。同時美國參議院也在同年10月3日通過600億美元的全球基礎建設案及「2018年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簡稱「建設法」），以整合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及美國國際發展署等兩部門為「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sup>169</sup>，欲與「中國」在全球基建領域一較高下，捍衛美國在全球治理及金融秩序的主導權。

---

<sup>168</sup> 中時電子報，美國有條件支持增資130億美元，世銀承諾減少提供「中國」貸款，<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7000273-260203> (查閱日期：2018年10月15日)

<sup>169</sup> 世界民報，美參院通過600億美元融資全球基礎建設，<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content/news/311937> (查閱日期：2018年10月15日)

## 第四節 小結

「中國」因為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及所處國際體系位置與歐美等西方國家不同，在參與管理全球性問題時更重視不干涉內政原則，傾向以務實有效的治理途徑解決問題。在「中國」國力日益上升之際，對於「負責任大國」的意識也逐漸甦醒，令其對維護利益與風險管控尋求更有效的制度平臺，其參與途徑可概分三個階段，包括善用既有國際制度與加強「中國」在其中的參與度，如對全球性議題適度表達其關切立場等；在與國際制度的整合過程中持續尋求國家利益，並透過與其他大國的合作，展現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新模式，如團結南方國家共維發展中國家利益等，然其仍接受與強權地位相符的全球性義務與責任；構建新的合作機制與多邊組織，改寫有別於西方主導下的治理合作架構與規則，並在新制度中展現其革新的形象<sup>170</sup>，如籌設亞投行等。

「中國」作為既有金融秩序的挑戰者，與美國的衝突不僅是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矛盾，也不僅是既得利益者與新興國家的對立，而是制度主導權與「第三方政治認同」的競賽，如今「中」美相繼透過拉攏第三方國家延伸其影響力，「中國」以「一帶一路」連接中亞、東南亞地區國家，美國號召亞太傳統盟友日本及澳洲共同推動「印太」戰略，兩者皆以基礎設施建設為號召，儼然形成對抗形勢。為免基建市場遭到「中國」壟斷，導致亞太地區政經格局轉變，美國國會已於今（2018）年10月通過600億美元的國際基建資金，將用於投資基礎設施、能源和數位經濟，作為「印太戰略」的一部分，未來美國在捍衛國際秩序及維持亞太第三方國家支持上將投注更多資源；印度身為區域傳統大國，也成為美「中」急欲拉攏的對象。

---

<sup>170</sup> 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遠景基金會季刊，18卷2期（2017），頁31-32

## 第六章 結論

自冷戰後，經濟在國際領域扮演的角色日漸吃重，對國家權力的消長亦成為有力的衡量標準與觀察點，「中國」長期觀察國際情勢，善於將內部經濟發展需求與對外戰略結合，透過經濟外交手段團結南方國家，以「鄉村包圍城市」、「無產包圍資產」的路線推動政經改革，形成對抗北方國家集團的重要力量，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便是「中國」推動整體國家戰略的關鍵支點，凸顯了現今經濟政治化與國際關係經貿化的發展趨勢。

### 第一節 國際關係經貿化

21世紀初最大的國際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經過近40年的持續發展，「中國」已從國際社會的邊緣走向全球經濟、政治和安全領域的中心，而經濟外交作為一種新型外交形式，在「中國」的外交實踐中也運用得越來越頻繁，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在新一屆中央領導層的大力推動下，經濟外交逐漸上升至外交戰略的高度，成為了追求國家利益及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重要途徑。經濟外交可概分為兩類，一是透過外交手段以獲取經濟利益，二是透過經濟力量以實現外交目標，在現今經濟掛帥，全球產業鏈成形的國際環境下，經濟已不再是國際關係的冷門類別，而漸成為與高階政治並列的熱門討論議題，隨著經濟問題政治化，以經濟問題為中心或以經濟利益為導向，透過經濟手段開展而來的經濟外交行為，也漸成為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勢<sup>171</sup>，凸顯國際關係經貿化的事實。

外交的根本目的在於實現國家利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經濟能力已成為外交的發展基礎及追求目標，經濟外交更成為一國促進國家利益的主要戰略手段。「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即是根據內部經濟發展需求及促進國家戰略目標而進行的整體佈局，將「一帶一路」置於「中國」經濟外交框架下進行解構，可發現主要具有幾項特徵：側重發展與主要大國的雙邊經貿關係、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整合、促進金融多邊組織的制度改革等，茲分述如下：

---

<sup>171</sup> 趙可金，非傳統外交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82



## 一、側重發展與主要大國的雙邊經貿關係

習近平任「中國」領導人後，首度出訪的國家便是俄羅斯，俄羅斯不僅是「中國」傳統盟友、重要鄰國，更與「中國」同為多個區域性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如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20國集團等，雙方在政經領域緊密合作，「中國」是俄羅斯的第二大出口國與第一大進口國<sup>172</sup>，兩國關係長期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點。相較「中」俄關係，「中」美關係更位於「中國」外交戰略的頂層，妥善處理「中」美關係也是支持「中國」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習近平自上任後兩度出訪美國，於2015年二訪美國白宮時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視為「中國」為營造適合己身穩定發展外在環境的重要舉措。隨著「中」美貿易衝突升溫及亞太區域勢力消長，「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協助「中國」西進與歐洲大陸進行經貿整合，使原歐盟、亞太、美洲三大經濟區塊重整，美洲大陸未來恐被孤立而遭邊緣化。

## 二、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整合

中亞、南亞及東南亞區域是「一帶一路」戰略「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樞紐，上述區域自古與「中國」交流密切，經濟上具互補性，市場潛力無窮，加上彼等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在南南合作原則上與「中國」有相似的發展背景及共同的利益基礎，使雙方在基礎設施的需求上有了進一步合作的空間，穩固南方集團形成與北方集團抗衡的力量，利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制定世界貿易與經濟的新規則。反觀歐洲地區，雖多為已開發國家，然在近年面臨經濟疲軟困境，「中國」看中歐陸國家成熟的市場、商品及勞務服務，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可扮演提供技術、資金的輔助角色，透過互聯互通建設之經濟走廊連結歐亞大陸，以「中國」一向的「鄉村包圍城市」模式推動以經促政，達成縮小南北差距之政經改革目標。若此戰略順利發展，美洲與歐亞大陸經濟對抗將升溫成為海權國與陸權國的對抗，而印度及非洲將扮演關鍵要角，成為「中」美爭奪原物料及市場的必爭之地。

## 三、促進金融多邊組織的制度改革

「中國」積極推動國際機制的轉型與改革，使之朝著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國際經濟合作創造和諧的發展環境。2015年9月26日，習近平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發表講話，指

---

<sup>172</sup> 商務部官網，2015年俄羅斯貿易簡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_9.asp?news\\_id=47063](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_9.asp?news_id=47063). (查閱日期：2019年1月25日)

出國際金融機構必須加快治理改革，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經濟，實現「共商、共建、共享」三大合作理念；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以及發言權，賦予各國平等參與規則制定的權利；同時強調發展協調機制，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便於能夠及時有效地解決國際經濟紛爭<sup>173</sup>。亞投行的成立便是「中國」推動國政經改革的創舉，意味著「中國」方案的出現，將帶領發展中國家選擇性接受西方的遊戲規則，凸顯金融制度改革及全球治理轉向的前兆，也間接顯示歐洲國家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靠攏的新趨勢，反映了國際權力消長的樣態。

由於「中國」經濟已進入對外開放的新階段，自過去的引進外資、出口產品，走向了對外投資、整廠輸出，故「中國」透過經濟外交帶領民間資本和國內企業走出去的「一帶一路」戰略，結合亞投行、絲路基金為輔開拓中亞、東南亞，歐、非等地市場將是刺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能<sup>174</sup>。亞投行是一場地緣政治、國家意志和金融資源的長期競賽，但亞投行也僅是北京試圖建立一個可以跟美國主導的戰後全球金融體系及秩序抗衡的機制的一部份除了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也都是「中國」經濟戰略的重要推手，隨著「一帶一路」拓展，亞投行業務規模將逐漸擴大，成員國也將持續增加而成為國際金融領域不可或缺的有力補充。



---

<sup>173</sup> 人民網，謀共同永續發展 做合作共贏夥伴，<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5/0927/c64094-27638798.html> (查閱日期：2019年1月25日)

<sup>174</sup> 潘英麗，亞投行的優勢與挑戰，<http://www.acem.sjtu.edu.cn/shine/insight/15885.html> (查閱日期：2019年1月25日)

## 第二節 臺灣對亞投行的因應之道

面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加速的趨勢，臺灣以出口導向為主之經濟發展模式自不能被排除在外，「中國」推動之亞投行是其「一帶一路」戰略連結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重要金融支柱，臺灣若成為會員，將有助與區域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參與跨國工程項目、累積政經資產等，故在客觀經貿發展之考量下，臺灣應積極爭取加入。然首當其衝面臨的便是加入名稱的問題，2015年馬英九任總統時期，臺灣擬以奧會模式的「中華臺北」為名申請加入亞投行創始國行列，惟遭駁回。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依《亞投行協定》第3.3款，非主權地區必須比照香港入會模式，由「中國」財政部代為申請，這與臺灣希望依據《亞投行協定》第3.2款規定，以亞銀成員身分加入之底線差距甚大，為免自我矮化，臺灣終止入行嘗試；自蔡政府上臺後，兩岸關係更加緊張，臺灣也更難以模糊主權的形式申請加入。

在「中國」亞投行牽線「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推動「中國」產業升級與技術移轉，形成以「中國」為首的「新雁行模式」，間接牽動了兩岸經貿投資與東亞分工，將衝擊臺灣企業未來發展的空間<sup>175</sup>，故即使缺乏政府領軍，臺灣企業仍應積極融入此波區域整合浪潮。依據「一帶一路」規劃，臺灣被劃入沿海和港澳地區共同發展，自「中國」改革開放後，沿海地區便是臺商投資的重點區域，因此臺商可在福建自貿區的平臺上深化兩岸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經貿合作，透過提供關鍵零組件等方式在供應鏈發揮優勢作用；或透過臺商東南亞基地爭取「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工程項目，在優勢領域如大型基建工程、綠色能源、智慧城市等領域加強兩岸共商、共建機會。

自效益面分析，「一帶一路」商機十分可觀，台灣的營建、運輸、資通訊等技術產業若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獲利機會甚大，此外，資金雄厚的台灣金融業，也會因參與亞投行融資而獲得更大的金融效益，故台灣實應把握此經濟「翻轉」的機會，集合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力量讓台灣乘著「中國」崛起的浪潮趁勢發展，避免因自我設限而淪為亞太經濟整合的孤兒<sup>176</sup>。

---

<sup>175</sup> 旺報時論，一帶一路已為臺灣鋪路，吳福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5000526-260109> (查閱日期：2019年1月25日)

<sup>176</sup> 吳福成，「一帶一路」戰略政策對台灣企業的機會與挑戰，台灣經濟研究院，頁10

###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亞投行是首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成立的國際組織，是「中國」參與多邊治理的新嘗試，也是「中國」大國外交的實踐。然由於其成立迄今不過短短三年，對國際金融環境及「中國」金融地位的影響仍待觀察，對國際制度及多邊治理的成效也尚未展現，故作者先預想未來可持續深入研究的問題領域如次，以作為日後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一、亞投行的內部治理問題，包括投票制度的設計、認股比例的分配、及董事會的責任範圍等。亞投行為凸顯亞洲新興國家主導權，在認股比例上採取域內國家75%、域外國家25%且以GDP為基準的攤額設計，影響歐陸等傳統大國之話語權；今因「中國」實際持股比例最高，享有一票否決權已受到各國詬病，「中國」如何在首創的國際組織中扮演領導者角色，透過制度的改革化解外界對亞投行治理的疑慮；亞投行中歐、亞成員發展歷史及金融成熟度相差懸殊，對於核心事務之協調模式及利益折衝也是值得觀察之重點；另亞投行今採不設常設董事會之運作模式，利弊及影響為何亦值得深入討論與比較。

二、亞投行營收成效及貸款審議標準是評斷多邊開發銀行最具體的指標之一。亞投行以基礎設施為目標的投資風險較高且回收期長，貸款國內部又通常併發政經治理成效低落、政府貪污缺乏效率、整體環境不利投資等負面條件，不利銀行收益及發展；加上亞投行明訂不干涉貸款國內政，支持巴黎氣候協議等主張往往與貸款國國內發展情形扞格，如何在維持亞投行設定之「綠色」價值觀的同時有效改善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與既有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又將如何促進制度的統一與融合，透過國際合作樹立亞投行的專業與信譽，都考驗著「中國」的智慧。故持續追蹤亞投行貸款項目執行成效，及對受貸國政經環境之整體影響有助了解亞投行貸款審議過程之利弊。

三、亞投行是「中國」投身全球金融治理、改善自身發言權及地位的重要嘗試，除有利帶動國內經濟持續發展，對於鞏固區域領導權及地緣政經佈局皆有功能，被視為對現今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挑战。美「中」衝突在經貿領域已一觸即發，然涉及制度層面的卻仍在起步階段，究竟「中國」以本身發展歷程為出發點之制度設計能否服膺國際需求，成為與世銀、亞銀並列之成熟機構，抑或經不起美國等傳統大國的挑战而曇花一現；人民幣將如

何透過亞投行進一步推動國際化進程；「中國」將如何透過多邊治理延伸其國家利益與戰略，國際格局將走向多極化抑或二元對立，目前皆言之過早，然「中國」經濟崛起對國際經濟秩序的潛移默化卻十分值得持續觀察與探討。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分

#### 一、專書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臺北:唐山出版社，2000年。

王逸舟，「中國」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王逸舟，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王學東，外交戰略中的聲譽因素研究—冷戰後「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解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尼克森著，丁連財譯，掌握時機。臺北:時報出版，1992年。

李巍，制度之戰: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阮宗澤，「中國」崛起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轉型:共有利益的塑造與拓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8年。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黃營彬、汪志堅，研究方法，臺北:新加坡南亞湯姆生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葉至誠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民88年。

#### 二、期刊論文

王若彤，「論當前金融體系下亞投行面臨的機遇及挑戰」。現代商貿工業(湖北)，第3期(2017年)，頁112。

王綺年，「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對全球政經軸心轉移之意涵」，展望與探索，第13卷第3期，2014年3月，頁31-39。

- 王智盛，「分析中國大陸金融外交－亞投行對臺灣之影響」，中共研究，第51卷第2期(2015年3月)，頁106-112。
- 王緝思，「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北京)，第84期(2005年10月)，頁13-16。
- 王耀東、張旭東，「中國多邊外交的發展與思考」，黨政論壇，9月號(2011)，頁41。
- 毛峰，「日本患上亞投行焦慮症」，亞洲週刊，第29卷15期(2015年4月19日)，頁20。
- 孔玥，「新時期中國周邊金融外交戰略」——以亞投行籌建對GMS成員國影響為例，雲南社會科學，第5期(2015)，頁24
- 吳若璋，「中國倡設亞投行的策略、發展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3期，頁51。
- 吳福成，「中國大陸推動建立多邊開發銀行的戰略思維」。經濟評論，第188期(2015年5月)，第8-10頁。
- 初國華，張昌吉，「後冷戰時期中共的對外政略：對國際社會與臺灣的意義」，建國科大學報，民國98年，頁112。
- 李海龍，「十八大報告外交戰略新思路分析」，中共山西省直機關黨校學報，頁5。
- 李瓊莉，「中國大陸周邊外交之政經作為——對外援助」。中共研究，第50卷第1期(2016年1月)，頁157-163。
- 李瓊莉、顏建發、李佩珊、楊三億主持、陳欣之評論，「中國大陸周邊外交之政經作為」。中共研究，第50卷，第1期(2016年1月)頁157-176。
- 沈銘輝、張中元，「亞投行：利益共同體導向的全球經濟治理探索」，亞太經濟，第2期(2016年)，頁43。
- 邱坤玄，「霸權穩定論與冷戰後中美權力關係」。東亞季刊，第31卷第3期(2000年夏季)，頁4-14。

- 邱坤玄，「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美『中』互動」。《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4期(2010年10月)，頁5-8。
- 邱坤玄，「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1卷第11期(2005年11月)，頁28-30。
- 邱昭憲，「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8卷，第2期(2017年4月)，頁1-44。
- 孫伊然，「亞投行、一帶一路與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外交評論(北京)》，第1期(2016年)，頁1-30。
- 孫靚瑩、邱昌情，「『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的南南合作：路徑與前景」，頁1~2。
-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2001年)，頁59-85。
- 陳欣之，「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政治學報》，第40期(2005年12月)，頁115-148。
- 郭可為，「崛起中的亞投行－中國提升全球領導力的試驗場」。《「中國」經濟報告(北京)》，第7期(2015年)，頁100-105。
- 閻奕舟，「亞投行對於中國的意義及中國面臨的挑戰」。《現代商業(北京)》，第24期(2016年)，頁85-86。
- 舒建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國際金融秩序」。《國際關係研究(北京)》，第4期(2015年)，頁15-26。
- 黃美鳳，「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118期(2015年2月)，頁4-12。
- 黃恩浩，「中國大陸在亞太區域的經濟魅力攻勢：對習近平經濟外交戰略之分析」。《中共研究》，第50卷第5期(2015年2月)，頁77-81。



- 黃奎博，「『一帶一路』- 中國大陸的亞太夢」，中共研究，第49 第 2 期(2016 年 9 月)，頁 26-41。
- 廖凡，「比較視野下的亞投行貸款條件研究」，法學雜誌(北京)，第6期(2016 年)，頁 22-30。
- 趙崢，「亞投行的發展價值和面臨的風險挑戰」，金融經濟(北京)，第 3 期(2016 年)，頁 13-15。
- 蔡明彥，「美國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佈局」，新社會政策，35期(2014)，頁18-19。
- 蔡裕明，「美國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認知與因應策略」。戰略安全研析，第 121 期(2015 年5月)，頁 5-11。
- 趙永祥、吳依正，「從亞投行與一代一路看中國海外經濟版圖擴張與對臺灣經濟發展之影響」。全球管理與經濟，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 12 月)，頁 99-118。
- 鄭宇碩，「十七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二十一世紀評論，頁15~16
- 謝世卿、胡東，「亞投行的國際挑戰略應對策略」，亞太經濟(北京)，第1期(2017年)，頁 41-45。
- 濱中慎太郎，「亞洲開發銀行、亞洲貨幣基金、東協加三總體經濟研究室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建區域金融制度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特集003(2016年1月)，頁119-134。
- 賽明成，「顛覆「中國」？透視『亞投行債券』與『帶路基金』」，問題與研究，第54卷第2期
- 薛健吾，「亞投行正式營運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戰略安全研析，130期(2016年2月)，頁 42-50。
- 顧賓，「亞投行的治理結構」。中國金融(北京)，第 13 期(2015 年)，頁 61-63。
- 鄭梅，謝超，「比較視角下的亞投行治理結構」，河北學刊，第37卷第5期 (2017年9月)，頁 127。

### 三、博碩士學位論文

侯俊榮 (2016) , 「習近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研究2012~2015」,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 臺北。

謝采彤 (2016) , 「習近平的『中國夢』到『一帶一路』的實踐」,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 臺北。

張君傑 (2017) , 「亞投行與國際經濟制度之政經競合-以結構現實主義分析」,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

### 四、官方資料

王宏仁, 「大陸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觀察」,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15年3月, 網址: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54151125376.pdf>。

「由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看臺灣金融業的機會與挑戰」,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會, 104年11月, 臺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委託研究。

「亞洲基礎設施銀行投資銀行協定」, AIIB, 2015年6月29日, <http://www.aiib.org/uploadfile/2015/0814/20150814022339326.pdf>。

「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上的致辭(全文)」, 「中國」外交部, 2016年1月16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32258.shtml>。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15年3月28日, [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 四、媒體

人民日報, <http://paper.people.com.cn/>

FT 中文網, <http://big5.ftchinese.com/>

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中國」評論新聞，<http://hk.crntt.com/>

金融時報中文網，<http://big5.ftchinese.com>

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www.ltn.com.tw/>

法國廣播電臺，<http://trad.cn.rfi.fr/>

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

壹讀，<https://read01.com/zh-tw/>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index>

## 五、網站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http://www.ndrc.gov.cn/>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www.mac.gov.tw/>

南南合作網，<http://ecdc.net.cn/>

## 貳、英文部分

### 一、書籍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 二、期刊

Chin, Gregory T.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Prospects,” *Global Governance*, Vol. 22, Issue 1,(January-March 2016), pp. 18-21.

Ikenberry, John G.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Jan/Feb 2008), pp. 23-37.

Nye, Joseph S. “China’s Rise Doesn’t Mean War,” *Foreign Affairs*, Issue 184(Jan/Feb 2011), p. 66.

Suettinger, Robert L.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2(Fall 2004), pp. 1-10.

## 三、媒體

Forbes , <http://www.forbes.com/>

New York Times , <http://www.nytimes.com/>

The Diplomat , <http://thediplomat.com/>

Wall Street Journal , <https://www.wsj.com/>

Washington Post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四、網站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 <http://www.aiib.org/html/NEW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https://www.adb.org>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 <https://www.cfr.org/>

Foreign Affairs ›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The World Bank › <http://www.worldbank.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